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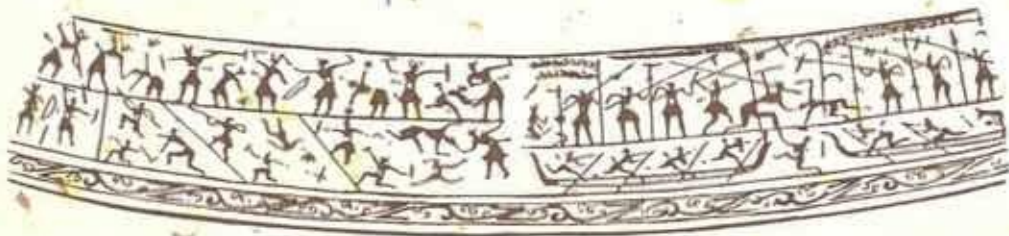
感懷4集

葉明勳◎著



感懷4集

葉明勳◎著



目錄

1. 封面
2. 目錄
3. 引言
4. 感懷四集 思賢篇
5. 效法舍老精神
6. 每逢國厄，輒思少老
7. 澹泊一生，心繫人文
8. 外交教父的緘默
9. 懷往事，傷斯人
10. 亦狂亦俠亦溫文
11. 惟誠與信最可貴
12. 國爲重，黨次之
13. 感懷4集 推介篇
14. 掌握契機的陸地神仙
15. 從書生報國到國士辦報
16. 感懷4集 新聞篇
17. 遠見與傳播媒體
18. 公正、公義、公益
19. 經營黨報的辛酸

20. 觀念轉變與把握機運
21. 平凡的實踐
22. 歐陽冠玉兄書簡序
23. 寫出時代的女記者
24. 感懷4集 時事篇
25. 走過台灣53年
26. 林森與陳儀
27. 李登輝先生的期許
28. 光復節的傷感
29. 一個台北老市民的祝福
30. 法務部長難為
31. 讚許信良賢伉儷
32. 談走出去
33. 薑是老的好
34. 能甘寂寞
35. 由烹飪業談到政治藝術
36. 由一個小故事想起
37. 「震怒」的商榷
38. 知識分子的悲哀
39. 貪得無厭
40. 「國本」漫談
41. 胡適與李遠哲
42. 總統與媒體摯友

43. 板蕩識忠貞
44. 對新政府的期盼
45. 陳總統的「絕不」
46. 溝通、虛懷、諍友
47. 誤事與害事
48. 「劃地而治」的厄運
49. 政務官的擔當
50. 感懷兩則
51. 徐州失散，古城相會
52. 人微言輕
53. 歷史是一面鏡子

引言

台灣以政治民主，社會繁榮，言論自由，人才眾多，雖非廣袤千里，卻充滿著挑戰性的競爭與變化，各種新聞，層出不窮。筆者來台，側身新聞界，已逾五十年，平時因接觸面較廣，從廟堂之上以至里巷之間，各種動態，如政局紛爭，民意沸騰，意識糾葛，人事代謝，說不盡的滄桑之變，無不都入眼底。十餘年前，即以所見所懷累積的情愫，或以思賢，或以論事，或以感時，或以懷舊，不計工拙，但求存真，先後在台灣各報及雜誌發表了不少的雜稿。後來親友之間，多以彙印專集相囑，於是民國八十四年便將所作略加整理，由躍昇文化公司出版，顏曰《感懷集》。繼以八十五年的《感懷續集》，八十七年的《感懷三集》，陸續問世。天下事一瞬數變，那些過眼雲煙，往往稍縱即逝，渺無痕跡。拙文雖不足以敝帚自珍，但從這裏亦可重尋過往的歷史軌跡。

今春重檢八十七年以後所撰舊稿，未經彙編付梓者，亦復不少。清代詩人黃仲則曾以「結束鉛華歸少作」自況，其寫作心情，此時心境，頗為相似。故再將未經彙編的舊稿，略加整理，成為《感懷四集》，有待高明有以教之。

葉明勳自識 民國九十年四月十五日於台北市

感懷四集 思賢篇

效法舍老精神

——紀念成舍我先生百歲誕辰

歲月不居，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日（九月二日），忽焉將至，緬懷舍老一生行誼，典範宛在，令人永遠不忘。

舍老作古後，我曾撰文追悼，刊載於八十年傳記文學月刊，對於舍老一生爲人不及之處，認爲至少有下列四種精神：

〔一〕盡瘁新聞事業。〔二〕涓滴歸公。〔三〕儉以養德。〔四〕事必躬親。

凡是曾經追隨舍老的人，對上述幾種，在生活體驗中都有見賢思齊的感覺。這種遺澤在人，今日追思，倍有斯人不可見的悵惘。我在世新創校四十周年紀念時，特別提出效法舍老精神，舍老從大陸到台灣，他對新聞事業的擇善固執，不以困難而退縮，不以阻撓而氣餒，能成人之所不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對國家社會所賦予的責任感，充滿磅礴堅毅的正氣。

最近，我讀到美國世界日報所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圖書館成立「成舍我紀念基金」的新聞，附刊特稿中嘉玲校長還提到舍老對子女的「三不」精神，使我對舍老的開明又增加了更深的認知。「三不」者，就是對子女的出處，不干涉政治傾向，不干涉宗教自由，不干涉婚姻、

職業自由。又說，每天下午四、五點鐘時，舍老常在客廳中讓子女們發表言論，無話不談，但總是無法戰勝舍老的辯才。

舍老思想開明從此可知，胸襟的寬宏，與見識的超越世俗，從而卓然有其獨特的風範，如民國七十一年長女之凡女士在巴黎以「選戰就是選和平」為口號，競選法國總統。現在大陸為外交官的次女幼殊女士，與擔任大陸全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的獨子思危兄，便可以事實證明他們的行徑，舍老都未加以干涉，父子之間，如此充分獲得自由，這是難能可貴的。

舍老一生的事業，在大陸為辦報，在台灣為培育新聞人才，兩者都是屬於新聞事業。前者，他在戰前十里洋場的上海所創的立報，小而美，精關的風格，為小型報獨樹一幟，民國七十七年已在台復刊，現由四女露茜小姐主持，仍然保持原有的風格，無愧舍老已得其傳人。而後者，舍老希望能為新聞人才缺乏的多難中國，培育專才，當初筆路藍縷，不能不佩服其深具遠見。如今世新創校已屆四十二周年，舍老桃李滿天下，三女嘉玲校長繼承父志，親炙庭訓，憑她的才智、學識、能力，都足以為世新廣拓新的境界。我已從嘉玲、露茜兩人的身上，找到了舍老當年的影子，這是足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靈的。

目前，台灣是一個多元化充滿競爭力的社會，也是知識爆炸的時代，沒有進步，就是退步。我們惟有效法舍老的精神，始能站在時代前面，不為時代所淘汰。世新歷屆畢業的校友，不乏傑出人才，無疑的將是世新發展最大的人力資源。我們懷念舍老，亦為世新寄以祝望，毋負舍老創校的精神與意願。

(原載八十七年九月一日中國時報)

每逢國厄，輒思少老

——紀念黃少谷先生百歲誕辰

〔一〕

黃少老（少谷）自歸道山，倏已五載，今年（八十九）七月二十一日為少老百歲冥誕，感時懷人，倍增嚮慕。追溯少老一生對國家的貢獻，志慮忠純，胸懷坦蕩，身歷憂患，功不自居，朝野各界至今無不感念。中央大學故校長羅志希（家倫），當少老於民國四十九年出使西班牙時，曾在賀年卡書「每逢國厄，輒思少老」八字以寄之。少老眾望所歸，殆已盡見於此八字。個人受教於少老逾半世紀，有感於少老行誼足為世之典範，發乎古人所謂羹牆之思，先後曾在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及傳記文學，自八十五年迄八十八年撰文六篇，茲節略為一篇，聊表思賢之至意。

〔二〕

少老祖籍湖南南縣，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歲次辛丑，農曆六月初九日，卒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享年九十六歲。少老原名亮，以傾慕北宋詩人黃山谷改名為少谷。湖南革命思潮開風氣之先，民初人才盛極一時。少老於民國九年就讀長沙明德中學時，便已嶄露頭

角，參與湖南學生運動，儼然為領導人物。平時雖很少說話，但每至重要問題難以解決時，必能提出對策，分析中肯，疑難迎刃而解，為當時學生群眾所悅服。

少老的一生，追溯大陸時代，從民國十二年，遠赴北京投考北京師範大學就讀後，即以半工半讀自立，開始與新聞界接觸，考入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老（舍我）當時所辦的世界日、晚報工作，兩人遂成莫逆。其後曾入馮玉祥將軍麾下，為馮所倚畀——馮在少老求學時，曾鎮守長沙，推行社會改革，為青年所嚮往，後來復以服膺國父，反對軍閥，頗有作為。惟以剛愎自用，難與合作，少老不得不分道揚鑣，但從不侈言馮之過失。民國二十三年，少老赴英，入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研究國際經濟，至二十六年抗戰軍興返國。監察院于院長右任聘少老為監察委員。抗戰八年中，少老歷任湖南行政督察專員、國防最高委員會處長、中央設計局委員、軍委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主委，及掃蕩報社長、政治部副部長等要職。

抗戰勝利後，少老曾參加制憲大業，民國三十七年，當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兼任國民黨宣傳部長。三十八年，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協助院長何敬公（應欽）處理國共和談事務。當時中樞拒絕中共苛酷的條件，少老居間處理重大事件的縝密，為人所折服。

〔三〕

少老一生對國家的貢獻，當以政府遷台後，以迄終老，那段由大陸來台將近五十年的艱辛歲月，身歷憂患，出力甚多，最為人所推重。民國三

十八年在台北出任總裁辦公室秘書主任時，在草山（陽明山）設館辦公，同年並隨總裁訪問韓國及菲律賓。三十九年總統復職，為行政院陳辭公（誠）故院長的秘書長，四十三年為俞鴻鈞故院長的副院長，五十五年為嚴靜波（家淦）副總統兼院長的副院長，先後在行政院任職達九年四個月之久，中間並曾繼葉公超為外交部長，及出任西班牙大使。五十六年，政府設國家安全會議，少老出任秘書長。六十五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以迄六十八年，出任司法院長，在職計七年十個月。

〔四〕

追溯政府遷台之初，大陸變色，執政黨痛定思痛，成立改造委員會，力圖革新。初擬改造委員名單，皆黨政精英，有少老而經國先生未在其列。少老謙讓自牧，期期以為不可，即向總裁陳情，願將己名剔除，改為經國先生。少老於民國五十二年西班牙卸任大使返國後，經國先生曾訪之於天母臨時寓所，建議少老出任駐美大使，少老以英語欠佳謙辭，並對經國先生說：「只望以後不做官，成為你的朋友，讓我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你也需要我這樣的朋友。」經國先生逝世，少老聯輓：「憂患久相隨，論事陳情，許我言無不盡。治平時在念，拯民救國，痛公志有未申。」二人相知之深，殆非虛言。

少老在陳辭公內閣四年多的秘書長任內，當時政府勵精圖治，推行全面經濟改革，以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他以和與忍從事斡旋，發揮了幕僚長最大的功能，使若干不同政見、不同利害，甚至有所挾、有所求、有所恃的反對者，大致都能諒解。陳院長大幅度的

改革措施，始能突破阻力。尤以周至公（至柔）任參謀總長時，建軍計畫，由行政院撥款，陳辭公與周至公二人，有嚴重齟齬，多由少老化解之。少老瀝盡心血，從不願以此告人。辭公逝世後，陳夫人譚祥女士曾感慨的說：「辭修在世時，少老幫了不少忙，但不爲人所知」，說時幾至淚下。孫子云：「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少老殆足以近之。

少老出使西班牙時，適值六十初度，陳辭公親筆書贈七律詩一首：「平生謀國此心同，廿載交親患難中。久歷艱辛多盛績，每因迴斡見深衷。能仁始信和無敵，不辱從知忍有功。執手依依惟惜別，壽杯香送芰荷風。」後來辭公逝世，少老悼念文中曾引用此詩，提到「和」、「忍」與「迴斡」，自稱長懷知己之感。他認為做一個幕僚長，就是要「聯上下，化異同」。

這裏附記兩件事，以見少老公忠體國的精神：

其一，立法院開會，立委質詢，每多逾越，行政院長不便答覆，但又不能不說明。少老列席以便條向陳辭公院長陳述意見：〔一〕人身攻擊，離間兩院關係，造成政潮，影響時局安定者，拒絕回答。〔二〕答覆時請以從容態度，和平言詞對之，萬不可發怒，致中挑釁者之詭計。

〔三〕政治家應付國會，應具容忍寬涵風度，舉重若輕。

其二，民國四十一年，吳國楨任台灣省主席時，與中樞觀點不同，時露不滿。少老於革命實踐研究院開會時，以便條向吳進言：〔一〕救亡圖存，辦法要大家拿，始合團結精神。〔二〕如在你等我，我等你僵持下去，豈不危險。〔三〕兄如洞燭機先，不肯拿辦法，胸有經綸而不肯說，令人莫測高深。〔四〕今日吾人同處漏舟之中，志在共濟，不論你

是大副或二副，只要有同舟共濟之道，都要趕緊向船長提出。可惜吳並未接納少老忠告，最後遠走美邦，誠屬遺憾。

民國四十七年，少老為總統特使組團前往阿根廷慶賀總統就職，並訪問美洲十一個國家，宣慰華僑。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便以「黃少谷訪美」為題，發表社論，稱少老足與當年楊永泰、陳布雷同樣為先總統蔣公所倚畀。

〔五〕

民國四十五年，因郭廷亮等人共諜案，牽涉到孫立人將軍，震撼國內外。總統蔣公派陳誠、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組織調查委員會，以陳誠為主委。此一委員會，包括一位副總統、三位前任院長、兩位資政、兩位現任副院長與一位部長，重要性可知。少老以此案涉及政治與國際觀感，力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原則，疏通各委員，結果率如少老所擬，以孫立人久歷戎行，抗戰有功，特准辭去總統府參軍長結案。少老於法紀之外，寓有寬宥之意，用心良苦。後來他對翻案文章之一筆勾銷當時真相，感慨頗多。

〔六〕

民國四十七年，政府外交重心集中於中美關係，為拓展新的境界，乃以外長葉公超為駐美大使，少老為嘉其成行，勉允繼任外長之職。少老曾

語人：「昔日爲外交舞台導演，舞台監督，今則爲演員，方知各有其難處。」他與葉公超兩人相交甚篤，每遇外交問題，經常商談至深夜，然後將意見報請總統裁決。兩人合作無間，多年來共同化解不少危機，少老總是居其實而不居其功。先總統與經國先生如對葉稍有不滿時，少老每爲之進言化解，乃使觀感漸爲轉變。

少老出任司法院長後，曾以絕句一首勉勵同仁，即：「明鏡止水以澄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霽月光風以待人。」後來復以「潤身以德，治事以才」、「嚴於克己，勇於任事」相勗。我們於此，亦可略窺少老對中國固有之道德文化，蘊藏之深，期望之殷。

少老從政六十餘年，所留給後代的典範，是在對權位無所爭，對責任從不推諉，待人則極寬厚。如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儼寰（震）因言論坐牢多年，出獄時，少老出力最多，雷氏夫婦並不知情，少老亦爲善不欲人知。

少老對革命先烈黃克強頗爲推崇，紀念克強先生百齡誕辰時，曾撰文稱：「既無權利思想，而對革命事業之至危至艱者，以身先之，任勞任怨，謗生不辯，功成不居，盛德大量，與世無爭，黨內外人士，多在其涵育中而渾然不覺。」此即少老的理想。

少老九秩大壽時曾說：「我是和平的象徵，從不製造問題。」又說：

「天下和爲貴，凡是向和平努力的，就是我的朋友，與此相反的，我不贊成」，這是對當年黨內紛爭有感而發的。

〔七〕

少老平生以報人自居，民國二十三年赴英留學時，曾與成舍老約定，計畫在南京、上海、北平、漢口、昆明等大都市建立世界日報網，各地分社刊社論兩篇，一為全國性的，由總社供應，一為地方性的，由分社自撰。少老抵英後，曾廣為搜羅有關資料，因抗戰發生，未及實現。後來他主持掃蕩報，差堪貫徹初衷。

勝利後，掃蕩報改名為和平日報，社址設南京。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在「我在南京辦報的回憶」一文中曾說：「在當時南京新聞圈裏，另一位突出人物是龔德柏先生，他是救國日報社長，是出名的龔大砲，喜歡罵人。他在報業公會開會時，無緣無故罵起黃少谷來，少谷先生一笑置之。以後，當龔大砲遭到處分，營救他的，卻是少谷先生。他不但不念舊惡，而且以德報怨。」

該文又說：「少谷先生辦和平日報，全神貫注，言論新聞之處理，均切磋琢磨，允當妥切。所以，雖在發行廣告上，中央日報勝於和平日報，在言論新聞之完整性上，和平日報卻有勝於中央日報之處。有一次因新聞上衝得太兇，總裁告訴我，要向和平日報看齊。以後少谷先生做了宣傳部長，對中央日報、和平日報，一視同仁，毫無軒輊。中央日報之遷台，少谷先生全力支持。我因受他的支持，才能做這件大事的，倒是和平日報沒有遷台。」

香港自由報於民國六十二年刊有「報人出身的黃少谷」一文，稱「少老如稍有政治野心，早有完整的幹部網，可能受曾國藩的影響，一生非常謹慎，不矜夸，不浮躁，待人接物，很少官味，不失報人本來面目。而且很少鬧過政治情緒，或以文字傷人。」文中又以資深報人陸鏗為例，

當年陸爲南京中央日報採訪主任，最高當局欲以報導不當論罪。少老時爲黨報主管，力諫「少壯之時閱歷尙淺，其行未必無過，若不准其自新，則人將以爲前過莫追後益，終成廢棄，故聖人不絕人有過，而責其不改。」這是何等風度。

少老雖居廟堂之上，但對新聞事業的發展，仍甚關注。民國四十三年，內政部公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掀起大風波，震撼海內外，引發新聞界普遍的不滿，台灣全島有如炸彈落於報界。民營中英文報紙著論嚴厲評述，呼籲行政院立即撤銷九項禁例，官黨營報紙雖未表示反對，但亦拒絕撰文支持「九項禁例」，等於無言抗議。立委程滄波、成舍我、許孝炎、胡健中等三十三人且聯名提出質詢，認爲違憲。演變至此，乃由少老以副院長身分召開座談會，聽取各報負責人反對意見。會後隨即召集黨政方面主管，集會長達四小時之久，決定主動令飭內政部將九項禁例暫緩實施。滿城風雨的禁例案，轉告消散。少老的雍容大度，盡心盡力，爲俞內閣解除一大困境，爲爭取新聞自由邁進一大步。

少老對新聞界的保持深厚淵源，以成舍老創辦世界新聞學院爲例，即出於他的贊助。他深知舍老事業心極重，戰鬥力極旺，而台灣在大陸淪陷之初，辦報受制於政治環境，活動空間無多，少老只得幕後爲老友推動致力新聞教育。民國四十五年，舍老邀集新聞界碩宿與社會名流十九人，議創新聞學院，就是假少老府上（行政院秘書長公館）商議的。

民國七十三年，蔣經國總統在職時，秘書長馬伯謀（紀壯）爲促進執政黨黨內團結時，曾走訪少老，認爲中時、聯合兩大報負責人余紀忠、王

惕吾二兄爲多年好友，又屬執政黨中常委，如以業務發展，互成壁壘，誠爲遺憾，乃央少老出馬協調。少老則以故立委王新衡與我二人，對兩報負責人均有深厚友誼，便邀商談。我們建議順其自然，將來自可化解。後來惕老去世，紀忠兄伉儷果然親往聯合報弔唁。

〔八〕

少老與台籍大老亦多交厚，民國三十八年隨蔣總裁來台之初，他的老友中央社創辦人蕭三爺（同茲社長），以我來台較早，地方情形頗熟，囑我（時任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多向少老請益，少老公忠體國，將來對國家必有貢獻，望我能爲他提供有關台灣的資訊。於是，我先後引介了林四爺（柏壽）、吳三老（三連）、謝求公（東閔）、連定一（震東）、陳啓川及辜公亮（振甫）等碩望人士，與少老相識。其中值得一提的，第一位是襟兄辜公亮，他與少老都酷愛余派老生平劇。不久台北市迪化街辜府老家，每月便有幾次絲竹管絃之盛，公亮兄才識，即爲少老所讚賞。當張麗門（茲闔）任經濟部長時，少老力薦公亮兄爲經濟部顧問。台泥公司由公營到民營，業務發展，爲水泥、工礦、農林、紙業四大公司之冠，而公亮兄由總經理而董事長，氣勢非凡。少老之知人，於此可見。

第二位是台灣耆宿林四爺（柏壽），四爺爲工商界名實相孚的領袖，本質則爲飽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典型讀書人。數十年來，林府冠蓋如雲，高朋滿座，少老與蕭三爺、黃達公（杰）、袁企公（守謙）、葉公超、連定一等人，都是常客，或詩酒自娛，或品評時事，那種風雅，爲台灣所

罕見。民國四十三年，當俞鴻鈞主閣時，少老爲副院長，擬請林四爺出任政務委員，以促進朝野團結，並囑我代爲商邀。但四爺是一位布衣傲王侯的人物，並未應允。後來嚴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宴黨政高級人士時，少老特邀四爺居上座，以重物望。

第三位是吳三老（三連），三老對少老極爲尊重，當時政治觸角敏銳，子姪輩因言行不慎被拘，少老爲表重視台灣耆宿，曾力爲營救。兩老從此建立金石似的交誼，三老爲少老祝壽，並邀南台灣之遊。國策顧問楊肇嘉去世，遺缺經嚴總統邀經國先生與少老商議，改聘三老，囑我轉達。三老以非執政黨員謙辭，告以政府尊賢始允。

第四位是謝求公（東閔），民國六十七年，經國先生當選總統時，副總統人選，經國先生曾親訪少老，徵詢意見，供其抉擇，少老如隆中對策分析現況，對求公諸多推重，乃成定局。

少老曾力主重用台籍才智之士，民國五十八年少老爲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時，仍兼行政院政委，認爲不宜佔此一名位，建議留與台籍人士。後來經國先生組閣，他認爲台籍部長至少需一人，當時他對連定一未能入閣，深引爲憾。

〔九〕

少老對領袖的忠誠與重視，於二事可見之，其一爲嚴總統於民國六十四年就任後，追懷先總統蔣公功德時，曾稱：「蔣公具有五種地位，即君、父、師、帥、魁，蔣公地位任何人無法繼承，而且無法比，不必

比，亦不宜比。」此為他人所未言。其二為蔣公逝世後，每於談論國事場合，少老深望一向慣持異議的谷正綱（故亞盟秘書長）支持經國先生一如擁戴蔣公，言訖流淚。谷正綱與張寶樹（故前執政黨秘書長）亦相對流淚。

少老於中美斷交後，在一次工作會議發言，對我遭侮辱有所感時，哽咽不能成聲。新聞天地以「黃少谷淚灑會場」為題報導。

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每與少老評論時事，多切時弊。少老曾說：「生存第一，有生存才能發展，我們必須以最高的智慧，最大的忍耐，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保持生存。」又說：「現在教育出來的青年，若干為當代歪風所惑，對國家社會無遠大抱負，無犧牲奉獻精神，唯利是圖，如何使其為公民，有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為當前政治上重大的課題。」

現已為人淡忘的「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八字，此為當年中美斷交以後，舉國震撼，人心浮動，街頭巷尾，用以安撫的標語，當時即出少老手筆，向中央建議的文宣重點。

少老一生重視傳統道德觀念，對他的母校湖南明德中學老師王鳳喈、余先勵、曾省齋，與北京師範大學老師鄧萃英、查良釗、溫源寧，都以生自稱。

相傳有二人與少老以跪禮相見，成為趣聞，一為新聞界碩宿馬星野，星老八秩壽辰時，病困多年，未與少老見面，忽聞少老駕至，以跪相迎，少老亦跪，相擁拍背，見乎其誠。另一人為「自由之家」李姓理髮師，為少老理髮將達四十年，於少老誕辰時，下跪拜壽。

〔十〕

少老歷任黨政要職，周詳練達，備見老成謀國，如：

〔一〕民國五十六年，海外羈留老年的執政黨大老陳立公（立夫）自美返台，少老迅即告知經國先生前往接機，政壇流言，頓時煙消雲散。

〔二〕民國五十六年，總統蔣公褒揚故行政院長孔祥熙令，蔣公信筆將文稿改爲「……得與蕭曹媲美」，少老商之總統府副秘書長黃伯度，皆以「蕭曹」二字，挑剔者將謂下令者自比高帝，頗爲不當，乃報告請示，幾經周折，蔣公遂將此句改爲「其訐謨勳業，自足千古」。

〔三〕老報人馬星野，生前常對人說：「少老知道黨國的秘辛最多，但出於他的口卻最少，甚至一言不發，如欲追究到底，必以哈哈大笑對之。」

〔四〕已故國防部長俞大維，學貫中西，亦以少老擅於調和鼎鼐，譽爲甘草。

〔十一〕

少老自奉甚儉，澹泊自安。民國五十五年，嚴靜波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時，少老爲副院長。當時他住在天母，借用台灣銀行宿舍，這是過去準備租給美軍中級軍官的眷舍，如無必要，少老不擬遷居。後來出任司法院長，交卸後，搬出公家宿舍，便到敦化南路他的令郎寓所去住。北宋寇準爲相三十年，不營私宅，有人贈以聯：「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

臺」，可詠少老。

民國四十五年，行政院興建石門水庫，設建設委員會，少老兼任委員，依規定支付交通費，至四十六年，只少老一人未領，積存新台幣達一萬六千餘元。少老告以決定不領，因當時立監委每為兼職攻擊支領待遇，吵鬧不休，少老表示：「寧願餓死，亦不領此款。」

民國五十二年，少老自西班牙大使卸任歸國，賦閒在家，每日閱報為遣。辭公當時仍兼行政院長，秘書長陳雪屏曾奉命數訪少老，有關金錢接濟，少老均未接受。

少老與葉公超交厚，葉恃才傲物，每有牢騷，少老常加勸慰。葉之知交廣東同鄉名畫家陳子和生前曾語人，葉公超平生最愛罵人，惟有三人不罵，即少老、林四爺柏壽與張茲闔（葉之南開同學，故前經濟部長）。葉自美卸大使職返台，言論突出，演變結果，出外每有情治機構派車跟踪。此事深為葉所不滿，數言於少老，少老亦一再言於經國先生，希望解除。至葉臥病榮總，車影始告匿跡。

少老平時無暇運動，七十三歲時，始學打高爾夫球，曾作詩自嘲，詩云：「七十三歲學打波，波不聽話可奈何，十次揮桿九不著，得意之作兩丈多。」這首打油詩，傳誦一時，亦可見生活情趣的另一面。

〔十二〕

綜觀少老的一生，克己為人，公忠體國，志慮忠純，清明在躬，意態自若，外則從容，內則沉潛，坦蕩澹泊之中，見其風度。這樣的政治人

物，古人已不可見，今人則不易見。今日重誦羅志希「每逢國厄，輒思少老」之句，令人倍增無限的感慨。

(原文見大同文化基金會出版單行本)

澹泊一生，心繫人文

——敬悼謝前副總統求公

前副總統謝求公（東閔）於本月八日深夜病逝寓邸，十四日遺體火化後，廿二日在實踐大學舉行簡單的追思儀式，隨即移靈彰化二水，將遺骨安置納骨塔。

求公瀟脫無羈地走了，追懷往事，心裏頓時引發無限的哀思。

台灣光復，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我以中央社特派員身分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由陪都重慶飛抵台北，求公與連定一（震東）先生等則在十一月始來台，比我約晚了一個月。他們來台後，發表求公為高雄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連定公為台北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與我同日來台的重慶大公報主筆李純青，原籍台北，與求公交誼頗篤。因純青兄之介，我認識了求公。

半世紀來，因職業關係，我與台籍人士往來較多的是連定公、吳三老（三連）與求公三人。民國四十年至四十四年，我任中華日報社長時，董事長是連定公。民國四十六年至五十四年，我任自立晚報社長時，發行人是吳三老。而求公在民國四十年兼任新生報董事長時，我是常董。他們三人，秉性互異，定公明快敢言，剛直不阿。三老緘默內斂，堅守原則。而求公則有容乃大，剛柔並濟，都令人欽佩。

求公雖歷任政府要職及議會首長（包括縣長、副處長、副廳長、秘書長、省主席、副總統、省議會議員、副議長及議長）但他的志趣不在政壇，尤其不慣官場的酬酢習俗。他最大的興趣是如何改造我國教育，認為目前的教學，過於刻板，缺乏彈性，如何改絃易轍，需要深入研究。他一生致力創辦的實踐家政專校，當時便曾向人說，辦的是過去所未見的新娘學校，希望能擺脫傳統的約束，另闢新徑。

實踐家專成立於民國四十七年，求公自任校長。在此前後，他曾數度與我暢談辦學的理念，希望能獲得各方人士的贊助，並有意要我將此構想轉達於台北板橋望族林文訪（熊祥）先生，林為內子華嚴的母舅，曾任台灣省文獻會主委，飽受儒家教育的傳統文人，樂育為懷，不遺餘力，對求公為人務實的精神，甚為欽佩，慨然應允，並參與實踐的董事會。

關於求公不慣於酬酢的習俗，有時也被人引為談資。當年省議會在台中霧峯時，每遇若干難題，省議會執政黨黨團書記，必邀請反對派省議員到台中市醉月樓酒家聯歡，化解歧見。某次，省議長黃朝琴要副議長求公邀幾位反對派議員商談解決紛爭，求公因身兼家專校長，不便上酒家，特地由台中來台北，商請沒有公職身分的台籍大老林四爺（柏壽）代作東主，邀約反對派省議員於台北市延平北路東雲閣酒家餐敘，一場爭議，就此化解。由此也可知求公做事的分寸。

求公被邀出任副總統，經國先生事前曾加周詳的考慮，並徵詢當時總統府資政黃少老（少谷）的意見，成為第一位台籍副總統。後來沒有連任，在他的內心實則早有「富貴於我如浮雲」的澹泊意念。

求公一生不僅意氣豁達，胸襟坦蕩，而且也有詼諧幽默的一面。每次友

好餐敘，只要已故行政院新聞局長魏景蒙在座，必然滿座生春。殊不知魏與求公如都在座，也有人人捧腹的另一面風光，景蒙兄講葷的故事，求公卻是詼諧的、幽默的笑話，意味雋永。如今天人永隔，想到古人所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求公的心目中，人文的傳承，須憑教育的力量，只有教育才是千秋大業。實踐大學的發展，將使他不留遺憾在人間。

(原載九十年四月十四日中國時報)

外交教父的緘默

——敬悼總統府資政沈昌煥兄

總統府資政沈昌煥兄於本（七）月二日猝然去世，已於十六日入殮，並將於近期舉行公祭。國失老成，感懷今昔，不勝傷悲。

昌煥兄與我同庚，都是屬牛，相交逾半世紀。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下旬，他以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公的秘書，隨蔣公偕夫人由南京飛台參加台灣光復一周年紀念的盛會，同行還有秘書曹聖芬、周宏濤二人同來。我以中央社記者的身分，於紀念會後同機飛往台中，再換車前往日月潭，隨行者有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等人。

民國三十九年，陳辭公（誠）執掌行政院，設發言人辦公室，昌煥兄任發言人。他住在台北市前中正西路八號，與舍間二號（即前市議會會址）咫尺相望，比鄰而居。當時我是台北中央社負責人，彼此因業務關係，來往比較頻繁。

民國五十七年，我與內子華嚴應西德政府之邀，前往訪問三週。昌煥兄正在梵蒂岡擔任駐教廷大使，聞我們道經意大利，特邀熟識歷史掌故的曾堉兄（故中央社社長曾虛白先生哲嗣）為我們暢遊羅馬的嚮導，在那裏原訂勾留三日，後來延長為一星期。昌煥兄除多次陪我們遊覽羅馬各名勝地區外，並在官邸設宴款待，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對我們的照

拂，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份情誼，至今難以忘懷。

昌煥兄一生，除歷任駐西班牙、教廷、泰國大使外，並先後兩度出任外交部長，第一次是民國四十九年到五十五年，第二次是民國六十年到六十八年，長達十三年之久。漫長的十三年，國際風雲的詭譎多變，美蘇兩強的劍拔弩張，國家處境的艱危不安，而兩岸互成壁壘的敵對情勢，無時不處於枕戈待旦，一夕數驚的戰時狀況。昌煥兄以身負國家重任，外則折衝周旋於國際壇坫之間，內則面對朝野各界所寄以殷切的期望，如非具有遺大投艱的卓越之才，何以濟之。所以，「外交教父」的享譽，其來有自，殆非溢美之詞。

昌煥兄致力於外交工作多年，若干措施或不免遭人責難，所指莫過於被視為故步自封、缺乏魄力與遠大進取的眼光。而這些指控實皆導源於「漢賊不兩立」一語。如此重大決策，他身為外交舵手，豈個人所能完全決定？

民國六十年，我們退出聯合國的前夕，有非洲先生之稱的前駐南非大使楊西崑，以代表團代表身分回國述職。他先向總統府故秘書長張岳公（群）報告聯合國情勢及是否退出與利害得失，並陳述若干友邦如美日等大國，都希望我們能仍留在聯合國，岳公聽了之後，要西崑兄面陳總統蔣公。據悉，總統聽畢，一語不發，最後只說：「你們缺乏革命精神。」「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決策，其所以形成，殆亦出於此。

昌煥兄忠於職守，為國家處境而憂，為元首分勞而憂，其見於大者，堅守國家政策，服膺領袖領導，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生所表現的耿耿忠心，默默以守，不改其行，不形於色，亦不與人論是非，大抵即古人

所謂危身奉上的風範。我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忠與誠都藏之於內，而不見於外。

上（六）月二十三日圓山大飯店重建完成的慶祝酒會，我與昌煥兄不期而遇，寒暄幾句後，他表示將於近日囑人送我家藏老酒兩瓶，為我充電。誰知僅隔數日，即傳出昌煥兄在榮總已於四日因病去世。人天永隔，生死竟如此不可期。

（原載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

懷往事，傷斯人

——敬悼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兄

「傳記文學」雜誌社社長劉紹唐兄於本月十日突然去世，震撼之餘，不禁令人引起了無限的懷念和感傷。紹唐兄於民國三十九年由大陸輾轉來台，翌年（四十年）我接任中華日報社長，他便前來看我，出示他的精心之作「紅色中國的叛徒」，這是他在大陸中共統治下親身體驗的實錄，希望我協助他在中華日報發表。當時中共席捲大陸不久，台灣處境艱危，對於大陸來台的人，背景如何，目的如何，無不存有戒心。他的大文，可否採用，不能不加考慮。當我讀完全文以後，深感他的感受深切，文筆流暢，足以反映當時大陸的民心。於是，我便取以與中華日報連董事長定一（震東）研商，決定應否刊出。連董事長還兼任執政黨社工會主任、台灣省府民政廳長等職，衡量取捨，自有他的尺度。後來復邀總編輯趙效沂兄共同研商，彼此都認為這是反共最真實、最深入的報導，可使世人對共黨的真面目有所認識，同意予以刊出。見報以後，轟動一時，美國新聞處特加傳譯，後來各國爭相轉載，文字達十六種之多，像揭了鐵幕黑暗的一角，成為反共有力的資訊。

當時台灣的新聞界，處境不同於今日，在中央則有中央日報，在省則有新生報，民營各報尚未崛起，中華日報處於兩大之間，言論限制甚多，很難展開突破性的作為，只有以充實副刊、藝文版內容，與另闢體育、

娛樂兩版，冀以獨樹一幟。感謝紹唐兄以「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文見賜，一砲而紅，從大陸來台的廣大讀者們，更以陸放翁所稱「幾歲中原消息斷，喜聞人自蔡州來」的心情，讀此大文。中華日報頓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感覺。劉紹唐之名，從此不脛而走，遐邇皆知。

我與紹唐兄訂交，便始於此時，多少年來，頗有道義相敦、肝膽相照的崇高情誼。而見於對國家之愛，彼此都有一種不苟於世俗的正直執著，相知以誠。每至酒酣耳熱之際，我們也曾坦率的暢談時局，品評人物。

紹唐兄的成功，我認為至少具有下列的特色：

〔一〕宏遠的見識——紹唐兄隻身來台，憑他的聰明才智，不賺大錢，卻去經營最為清苦的文化事業——辦雜誌，而且貴乎從大處著手，遠處著眼，實踐胡適先生所說「為文學開新路，為史家找材料」的理想。一人敵一國的野史館長之譽，為古今所罕見，決非溢美之詞。

〔二〕堅定的毅力——紹唐兄憑一己之力，赤手空拳，創辦「傳記文學」，迄今將達四十年的歷史，只有卜少夫在香港所主持的「新聞天地」，足以媲美。其中所遭遇的艱辛和挫折，自非外人所盡知，如非具有堅定的毅力，不屈不撓，曷克臻此。

〔三〕豐沛的人脈——紹唐兄交遊極廣，從廟堂之上，達官顯紳，以至學術界名流，無不樂與交往，備受推崇。所以，傳記文學的發行網，無遠弗屆，從歐美各大都市，以至中國大陸，這本如讀現代史的雜誌，到處爭睹為快。

〔四〕不變的立場——傳記文學以不登筆名、不登應酬文章標榜，至今三十多年，仍然不以時代改變，媒體競爭，改其立場，始終保持一以貫

之，見其清流。紹唐兄認為這是對歷史、對讀者的負責。

如今紹唐兄已去遠，但他的「傳記文學」，依然見於我們的案頭，睹物思人，倍增感傷。但願「傳記文學」繼任的主持人，賡續紹唐兄的精神，永耀而勿墜。

(原載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中國時報)

亦狂亦俠亦溫文

——敬悼卜少夫兄

自獲悉少夫兄身罹重疾以後，不禁百感交集，繼以讀到他的「向朋友們揮手」、「我自橫刀向天笑」二文，文筆矯健，如見其人，何等曠達，何等坦蕩。只望奇蹟出現，能為這位新聞界耆宿廣續生命的光芒。

但是，新聞界的老友們與我都失望了，他像當年中央社創辦人蕭三爺（同茲先生）所說：「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噩耗傳來，那麼迅速，那麼灑脫。他的吆聲，他的笑貌，他的妙語，他的豪氣，彷彿仍然環繞著我，是假，是真，是天上，是人間，使我忘掉什麼是死，什麼是生，也使我想到：

——當年新聞界十一位鬥士，風雲際會，他們在戰時的陪都重慶，合力創辦新聞天地雜誌，這份異軍突起，充滿活力的新穎刊物，從抗戰勝利到戰後動亂，從重慶到香港，從三十四年到八十九年，都因少夫兄的努力，才能保留了最具有歷史光環的新聞雜誌。如非少夫兄旺盛的戰鬥力，只恐早已半途而廢。回首當年十一位鬥士，歷經多難的歲月，先後凋謝，現尚健在的只有少夫兄與丁中江、陸鏗、樂恕人四人。而今少夫兄又離開我們了，新聞天地也隨而停辦。人書俱亡，此情何堪。

——過去新聞界有幾位才氣縱橫，都以善飲聞名的老友，最為人稱道的

是英文中國日報創辦人魏景蒙、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香港新聞天地主持人卜少夫、中央社倫敦分社主任曾恩波，包括不才在內共有五人，如今歲月無情，四人已先後作古，惟我獨存。想到曹子桓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能不感傷，人生聚散，難以逆料，真有四顧蒼茫的落寞。

清代詩人龔定庵有詩云：「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已為我們道出惜才的心情，像少夫兄這樣富有才華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們為他讚譽嗎？他有狂態，他有俠氣，他也有溫存儒雅的一面。我們於此，如看到將近兩百年前，便有詩人為他素描，為他留下了無限感性的註解。但是，天地悠悠，歷史如在重演，人才總是歸於泯滅。回顧這個世界，功利氾濫，人才寥落。追念少夫兄，只有倍增斯人不可見之痛。附錄輓少夫兄聯於此，以誌永懷。

六十年一貫精神，觀世變，揚正聲，遣懷尊酒曾相共。

三千牘名山事業，溯前塵，傷久客，累卷遺篇不忍看。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六三號)

惟誠與信最可貴

——追懷國策顧問陳江章兄三兩事

論交友，在中國歷史上，以東漢范式與張劭的故事，流傳最廣，也最爲動人。范式遊太學，與張劭交厚，曾約以後二年當過拜尊親，屆時張劭殺雞盛餐以待，張母認爲二年之別，未必可信，張劭則以范式重信，必不違約，未幾，果至。後來張劭死，范式夢見劭告以送葬日期，但出殯時，柩不肯移，等到范式以白馬素車號哭而至，柩始進。

像這樣重視誠信的人，當今之世，國策顧問東南水泥公司董事長陳江章兄，頗足以先後並輝。所以，當他去世後，我便想到范式張劭的故事，愴然不能去懷。舉例來說：

〔一〕江章兄參加台北的慶生會，已二十餘年，會中多朝野耆宿賢達之士，每月十五日定期約會一次，每次他從高雄搭飛機趕至，很少爽約。見面時，互傾積愫，十分歡悅。

〔二〕江章兄與黨政軍工商大老多有往還，對黃達雲（杰）將軍私交尤篤。江章兄雖爲企業家，但以愛國家，謙沖敦厚，且重信諾，處事能以真誠去其阻力，解其逆境，爲人所難。達公任台灣省主席時，每當政府遇有重大事項，需要台灣南部地方協助，多商於江章兄，江章兄則謹慎將事，言必有信，從不負所託。

〔三〕江章兄每次相晤時，必問何時到高雄一遊，我以過於吵擾，不願告知。四年前春假，我率領永新公司同仁赴南部旅遊。江章兄適在台北，聞訊即邀亦在台北之高雄「海天下」餐館負責人同機回高雄，盡地主之誼，招待我們，飽嘗海鮮之美。江章兄對人之懇切，確屬罕見。

江章兄已離我們而去遠，我不想在此盛讚他的企業大才，因為這些已有太多的表揚與報導，只想在此以他最為人罕見的誠信一面，略記三兩事，以表達我永遠的傾慕與懷念。

(原載陳江章先生紀念刊)

國爲重，黨次之

——追懷台籍碩宿三大老

不久前美國總統大選，小布希與高爾二人相互對峙，延宕不決，舉世矚目。但當塵埃落定，勝負分曉以後，他們服膺民主精神所表現的胸襟，如撥雲見日。尤以二人所發表的談話，都以國家爲重，政黨次之，呼籲兩黨彼此尊重，共同合作。高爾並稱國家須置於政黨之上，全力支持新總統，樹立民主典範。對日抗戰的時期，我們政府在各黨各派紛爭不休之際，揭舉「國家至上」的目標，昭告全民，面對敵人，舉國敵愾同仇，無不奮然而起，投入效忠國家的行列，那段歷史，與當前美國所表現的精神，同以國家爲重，政黨次之，可謂中外互見光輝。

台灣今日的政治生態，各黨形成尖銳的對立，壁壘分明，各持己見，爲社會構成不少的動盪衝擊。如談國家爲重，政黨次之，似乎曲高和寡。我們如追溯寶島過去老一輩的人物，若干人處於風雲際會之間，爲社會輿望所重，不熱中政治，澹泊名位，風骨岸然，有異於目下青年才俊的作法。光復後五十多年來，筆者所知具有碩望的人士，其中如已作古的林柏壽、吳三連、陳啓川三大老，或以不入政黨，或以不入宦途，超然不群。但對國家之愛，並不後人。

林柏壽澹泊名位

林柏壽先生（一八九五—一九八六），為光復後台北板橋林家望族最長的一輩，因排行第四，多以四爺尊之。他出生於滿清割讓台灣之初，留學日本，並在倫敦經濟學院完成大學教育，後又赴巴黎，習法文。本質上，純然是受儒家文化薰陶的讀書人。日人曾多方設法借重，因遠走上海、香港等地，不為所用。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他認為平生心願已實現，三十七年回台定居。

陳辭公（誠）主持省政到後來組閣，都以土地改革為施政重點，四爺首先響應，將祖先良田全部由政府徵收付與耕者。當時台泥、工礦、農林、台紙四大公司開放民營，他被推為台泥董事長，業績為四公司之冠。平時宴客自掏腰包，汽車不坐名牌，剩餘特支費移作公用，傳為談資。某次，台灣警備總司令陳養公（大慶）在四爺民生西路寓所為座上賓時，得知四爺每年需赴港探親兩次，擬另給通行證，無需再辦出入境，四爺不願享此特權，仍照一般市民規定從基層申請辦理，陳養公深為敬佩。迨俞鴻鈞先生組閣，擬請四爺擔任政務委員，並未應允，自稱不想做官。後來先總統蔣公責成台灣省主席周至公（至柔）負責籌設台灣電視公司時，董事長一職，詳察現實情勢，至公以四爺為最適當人選。當時角逐者頗眾，人事很難安排，至公再三表示仰仗之殷，但未為四爺所允，後因至公誠懇權商，始告同意。台視從籌備到突破困境，業務蒸蒸日上，從此電視在台灣閃爍著無限的光芒。四爺並不自大其事，自尚其功。

四爺一生所擔任的董事長以台泥、台視、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及改為民營的中國銀行最為繁重。但他領導群倫，舉重若輕，小事不問，大事必堅

守原則。氣度恢宏，吐屬溫和，言不在多，語必中肯。見者如對清風明月，欣然而有仰慕悅服之感。

四爺亦為最懂得生活藝術的人，他在陽明山自築「蘭千山館」，珍藏許多中國歷代書畫與古玩，尤以古硯為他最所鍾愛，並曾精選三百多件書畫寄存故宮博物院。

四爺熱心公益，為人稱道，如資助重建板橋林家花園及國防捐等，私人捐款當年便高達新台幣數千萬元。但他始終以在野之身，不屬於任何政黨，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超然物外，澹泊以終，而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及其熱愛，絕不後人。

吳三連大處著眼

吳三連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八），三老立身處世都能從大處著眼，蓄於內而不見於外，修養境界極高。他有異於世俗的正義感，也有守正不阿的情操。早年留學日本東京商科學校，鼓吹民族運動，曾任台灣新民報總編輯，揭發日人治台暴政，為日方忌憚。

民國三十一年，三老由日潛往大陸，避居天津。台灣光復後，三十五年協助滯留平津數千餘名台胞返鄉。三十六年，因孚眾望，以二十三萬多票當選國大代表，為全國代表中得票最高的一人。三十九年奉派為台北市長，四十年復膺選為第一屆台北市民選市長。後來出任省議員，歷時六載，每次質詢，都具有建設性與前瞻性，鞭辟入裏，言之有物，決非一般泛泛作政治秀者可同日而語，極為當時省府主席周至公所賞識。

民國四十年，國民黨支持無黨無派的三老競選市長時，當他在台北市中山堂以茶會招待各方人士發表競選演說，突然有未為國民黨所提名的某高幹，不甘示弱的闖入會場，大放厥詞，場面十分尷尬。三老卻能處之泰然，那種有容乃大的器量，當時無人不加讚歎。後來有人戲稱三老是用肚皮辦事，意者，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很像蘇東坡評贊張良的成功，妙在得力於「忍」這個字。

三老當年對那些被捕黨外人士，曾向總統經國先生請求，如涉及刑責，希望從寬處理。至於受刑人申請假釋及改善待遇，三老亦加聲援。

嚴總統靜波先生在職時，聘三老為國策顧問，希望對國事有所諍言。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及總統時，曾多次召見三老，徵詢國是。他的回答，都以政治大方向為民主，經濟上必須保持繁榮與不斷的成長，外面的大風浪，便不至影響台灣的生存。今日追思，值得當政者三復其言。

民國四十六年，自立晚報改組，三老出任發行人，我為社長，共事六年之久。當時報社以無黨無派標榜，三老與我，處理言論及新聞見解，在無私無偏的情況下，彼此都能愉快合作，相互尊重。三老尤能從大處著眼，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令人欽佩。

陳啓川移孝作忠

陳啓川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九三），夙有高雄大家長之稱，世代殷商，高雄望族。早年留學日本，後來轉到香港大學深造。一生熱心公益，樂於助人，最為人稱道者，如：

第一，總統徵召競選市長——先總統蔣公以啓川先生深得人望，盼能競選高雄市長，約台省副議長謝求公（東閔）偕往高雄邀約面談。啓川先生晉見時，以老親須侍奉爲由懇辭，蔣公告知：「久聞先生家業興隆，深得高雄市民仰望，望能移孝作忠，出任高雄市長候選人，爲國家貢獻心力。」啓川先生終於應命競選第四屆高雄市長，並高票當選，四年後復連任。任內不支薪，政通人和，堪爲縣市長典範。

第二，響應政府土地改革——啓川先生率先將私有土地三百多甲，配合政府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由政府徵收後放領，廣大佃農得以受益。他爲社會其他公益事業，慷慨捐獻，亦復如此，造福地方，不遺餘力。

第三，新創高雄醫學院——啓川先生在民國四十三年捐獻十一甲私有土地，創辦高雄醫學院，成爲高雄市第一所高等學府，台灣當年富有的人，很少有這種爲國育才的理想，可稱爲地方開風氣之先。如今畢業校友已逾一萬人以上，到處都可看到他們爲社會服務。

第四，重視新聞文化事業——日據時代，啓川先生與蔡培火先生等鑒於民族意識沉淪，乃合力創辦「台灣新民報」，鼓吹民族思想。另在高雄創辦「興南新聞」、「高雄新報」，都以推動民族運動爲旨。

結語

林柏壽與陳啓川二老爲國家捐獻，超過一般國民黨黨員，當年總裁蔣公至爲重視，曾特派副秘書長連定一（震東）先生專訪與連有世交之誼的

林柏壽，希望入黨。林告以爲國效勞，無關入黨或不入黨，未改初衷。

前台北市長高宗適（玉樹）先生曾稱：平生以林柏壽、吳三連、陳啓川三老是他最所欽佩的人，因三老不與人爭利爭名，有學問，有涵養，也有超然人格，深愛國家，一切以國家爲重，誠非虛語。

天地悠悠，古調音雖美，但不知今人還彈否？

（原載九十年一月九日中國時報）

感懷 4 集 推介篇

掌握契機的陸地神仙

——恭祝陳立公百齡大慶

今年九月六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為曾任黨政要職的執政黨大老陳立公（立夫）百齡大慶，朝野各界無論識與不識，都將為這位國之人瑞共申祝嘏之忱。

我們傳統的觀念，都認為有大德者必享大壽。這個德字，廣義而言，包括對國家對社會的貢獻，如禮記所說的「百姓之德」，為人類福祉閃耀著無限的光輝。主宰的力量，則操於能否掌握契機，扭轉乾坤，其中成敗得失乃由於有識與否而定。歷史上很多契機，往往未能及時掌握，失之交臂，以致導向不可期的變數。如謂天命，不如說這是操之在己的智謀。漢初鴻門宴上，如非張良對劉邦示警，促其脫身，或有殺身之禍。漢末劉備如能接納忠言，或不致有連營之敗，飲恨白帝城。這些演變，都是決定於能否掌握契機。民國以降，戰禍頻仍，十四年，先總統蔣公在廣州已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負國父託付之重，誓師北伐。其時共黨份子偏佈黨內，且與汪精衛勾結，意圖顛覆，奪取政權，汪雖為國民黨中常委兼軍事政治兩委員會主席及黃埔軍校黨代表，集大權於一身，而實權則為共黨所操縱，但軍權則屬蔣公，汪系視為障礙。所以，黨內先後發生廖仲愷被暗殺，胡漢民被迫出國，蔣公處境陷於孤立。汪以受共黨挑撥，欲擱置北伐計劃，逼退蔣公。當此之際，蔣公不得不準備出國赴

俄，立公時參與機要，僅二十七歲，見蔣公正於躊躇猶豫時，默察處境險惡，立即進言勸阻，蔣公出國計劃亦即取消。此一轉變，大局因而挽回，導致汪精衛出走。當時蔣公之赴俄與否，影響後來變局至鉅，實為近代史轉捩重點。立公發於良知，激於正義，及時明斷去從。否則，後來如何北伐，如何抗戰，如何賡續中華民國歷史，都將成為不可期的變數。今日緬懷七十餘年前的往事，深感立公當時進言，為國為黨的忠貞精神，非僅具有政治家洞燭機先的典範，而見於劃時代的意義，尤為可貴。立公一生投艱負重，貢獻良多，惟此一事，至今常為人津津樂道。

立公來台以後，遠離政壇，澹泊自安。但他為培育後進青年的熱忱，一如抗戰期間在陪都重慶出任教育部長七年時的高瞻遠矚，當時先後在重慶、成都、貴陽、昆明、西安等地使公私立各大學復校，救援數十萬戰區流亡失學青年，至今仍感其德。立公在台所主持台灣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超過半世紀。熊徵公係台北板橋望族，早年為同盟會旅日會員，協助革命事業，輸財無數。黃花崗之役，即以鉅款購置軍火，惜在台灣光復後去世，未及見後來之盛。基金會所設獎學金，至今受益者，已達三千五百餘人，包括蕭萬長、宋楚瑜等人。立公平時自奉甚儉，動以養生，靜以修心為其端居生活準則，全其自健之資，望之藹如。去年以九十九高齡且曾環遊世界一百日，儼如陸地神仙。

我們既欣聞有大德者必享大壽，而見於恢恢乎弘其德，則必弘其量，而弘其量，則必弘其識。立公於此三者俱備，不僅有德，而且有量有識。追溯大陸形勢逆轉時，立公為執政黨備受責難，受謗而不自辯，忍辱負

重，不爲外力所動，坦蕩以見其胸襟。曾國藩以享大壽者，皆秉剛直之性，寸衷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動，殆此之謂歟。

謹以短文致善禱，而使世人能崇其德，尊其行，有所知之。

(原載八十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國時報)

從書生報國到國士辦報

——賀余董事長紀忠九秩大慶

農曆歲次己卯三月初七（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為中國時報系創辦人余董事長紀忠兄的九秩大慶，紀忠兄的母校國立中央大學，將於同月二十六日以榮譽博士相贈，這是近年來新聞界的盛事，將來歷史學家撰史，也必然肯定為中國新聞史上的大事。

紀忠兄與我相交逾半世紀，側身新聞界，歷經憂患，平日雖處境不同，但所持對國家之忠愛與正義感，彼此氣誼相敦，擇善固執。古人以大德必壽，值茲良辰，豈能無一詞為賀。

紀忠兄出生於江蘇武進，其尊翁幼舫公留學日本，習軍事，曾倡邊防方略。母儲太夫人為通儒之後，詩禮世家。紀忠兄故自幼即受中國書香門第的教育薰陶，兼以思想開明，具有時代眼光。二十三年中大畢業後，即赴英倫留學。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奉太夫人手書，返國從軍抗日。初為名將胡宗南秘書，未一年，派任中央軍校西安分校政治部副主任，旋升主任，創辦力行雜誌，激勵青年報國意願。三十一年，入重慶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訓，並在重慶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副處長，旋升處長。三十二年，奉派任青年軍第二零三師政治部主任。勝利後，隨熊式輝將軍任東北行營政治部主任，復兼執政黨東北特派員、中蘇日報發行人兼社長等職。三十八年來台，初任台灣省府物資調解委員會處長，未

一年，創辦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當時政府遷台未久，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人心未安，而紀忠兄卻能毅然創業，從植根工夫做起，以辦報安身立命。

緬懷紀忠兄英倫返國後，春秋鼎盛，正值國家多難，因時際會，以忠貞特達之資，戰時所任工作，無不為各方所重，即已彰顯他的才智綽綽有餘。這是當年有為的愛國青年投筆從戎的道路，至今令人讚賞。

三十九年，「徵信新聞」創刊時，政府正從事經濟發展，勵精圖治。紀忠兄以有限的力量，配合國家戰亂之後的建設需要，創辦這份以財經為主的報紙，為民服務，並揭櫫「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為辦報宗旨。發行後，影響力迅速擴展到社會各層面。中時四十七周年時，他曾追憶說：「當年創報的時候，我們是排名最後最小的報紙，也是獨立奮鬥沒有任何背景的報紙，我們始終確保自主與獨立的立場，從未接受公家的資助，亦從未假借公器謀取報紙任何的利益。」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為中國新聞事業樹立新的典範，令人欽佩。

四十四年，「徵信新聞」發行日廣，聲譽日著，由僅佔地三十三坪的台北市開封街社址，遷至現在大理街的時報大廈。紀忠兄與報社比鄰而居，以報為家，日繼以夜的全力投入報紙的發展。他在陽明山雖自置別墅，但捨而不用，只留一對看家夫婦與狼犬看管，問之則哈哈大笑。

四十六年，台北市爆發劉自然事件，數萬群眾遊行抗議，導致反美風潮。紀忠兄親撰「同胞們，現在不是逞意氣的時候」社論，呼籲朝野冷靜理性的處理問題。後來終於撫平群情，無損中美邦交。這篇社論，不禁使我聯想起輿論的力量，當年上海的大公報，發行量並不高，但從西

安事變到抗戰，每至國家面臨艱危之際，一篇社論，慷慨陳詞，往往協助大眾整清視野，認定方向，發揮獨立輿論的功能，為朝野所重。

紀忠兄每至關鍵時刻，必親撰社論，除上述劉自然事件之外，還有其他大文。四十七年政府公佈修正出版法，紀忠兄即親撰社論，指出此事危害新聞自由。六十七年中美斷交時，又撰社論以「讓我們沉住氣，攜手堅強的站起來」為題，呼籲團結。七十一年美洲中國時報創刊時，以「自由、民主、愛國家——我們一貫的信念和努力的方向」社論為發刊詞。七十七年，報禁解除，又發表社論「樂見報禁開放——為民主自由的雄者」。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時，復以「以黨政領導的一元化促成全國的團結」社論追悼，以安大局。七十九年，選舉總統，引發政爭，再以「緊急呼籲停止政爭相忍為國」發表社論。八十七年，發表「主動提出政治談判議程，開發兩岸和談新局」社論，以應變局。他的一貫主張是：堅持「自由、民主、愛國家」。是日文已脫稿，半夜就寢時，忽憶「中華民國」四字，應改為「中華民族」，含意更廣，即囑取回更改，可見他用心之細，隻字不苟。譯學大師先太岳父嚴幾道（復）公在世時，行文著墨，每每「一字之立，踟躕經月」，其理相同。

紀忠兄曾以當年大公報的「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精神，與紐約時報的「無所畏懼」、「無所偏愛」的風格，引以自我期許。八十年，紀忠兄對世新大學學生講話時，曾說：「辦報的要求是：下筆落墨，都能循著一條路線，愛國家，愛真理，辨別人間是非善惡，為支持正義而發揮報人的人格與報紙的尊嚴。」一篇談話，擲地有聲，乍聽似無驚人之處，但稍知中國報業發展歷史者，都知道近百年來在政治宣傳與商業廣

告兩大力量之間，國人辦報，能堅持這樣立場，需要多大的圓熟涵養與潛在艱辛。

五十七年，歷經十八年的努力，紀忠兄將「徵信新聞」更名爲「中國時報」，並改用彩色印刷，爲亞洲第一家彩色印報。社論中指出：「徵信新聞」四字，就其辭義，已不足以適應當時國家在混亂多變的世界局勢。

紀忠兄過人之處，不但在於他的素養深厚，思維精密，而且更在於具有前瞻性，掌握時代的脈動，不泥於過去辦報只重文字，轉而致力新的企業管理，及如何運用科技，建立全球性的資訊網。

四十六年秋，我應邀參加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立五十周年紀念會，逗留密大校園一週，除與會學者外，全美各大報主管幾乎都出席，會中所研討者，不外自由理念、報業管理、技術發展。紀忠兄辦報，不但有見及此，且具全盤眼光，洞察機先，並以具體實踐，付諸力行，爲我國報業開拓新的局面。

以紀忠兄重視言論爲例，他不僅親自寫社論，而且將言論的寫作企業化，期以鞏固輿論的基礎，不惜禮賢下士，登門求教邀請新聞界高手及專家，參加時報系的團隊，成爲人才庫，儲備不少有識之士。據我所知，如王作榮、戴杜衡、趙效沂、汪彞定、王昭明、楊迺藩、李廉、馮志翔、沈宗琳、李荊蓀、歐陽醇、張繼高等，都曾爲他所羅致。紀忠兄不僅能求才，亦能養才識才。所以，社論每有駸駸乎凌駕而上之勢。五十年來，潮起潮落，多少人留在那裏伏案疾書，又在那裏出入聚散。但是，無虞匱乏，我們每日翻開中時系各報，便可發現新人頭角崢嶸，如

長江後浪推前浪，不時崛起，他們的寫作，無不燦然可觀，這是得力於紀忠兄的養才識才。

六十四年，繼「徵信新聞」更名之後，成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發行中國時報海外航空版。七十一年，復在紐約、洛杉磯兩地同時發行美洲中國時報，這是他鏗而不捨的鴻圖大展。創刊僅兩年，銷路已逾六萬份，不料竟因新聞報導為國內黨政高層若干保守派人士所不認同，導致外匯中斷，只好宣佈停刊。兩年前，我邀請幾位同業友好陪他小敘，談到此事，仍然耿耿於懷，難抑積憤，幾至熱淚盈眶，這也是另一種「壯志未酬」的英雄挫折，足證作為中國報業領袖人物的難為。

中時系龐大的事業，舉其犖犖大者，如六十六年，發行時報周刊。六十七年，工商時報創刊。六十八年，時報雜誌發行。七十一年，A B C宣佈中國時報每日直銷數，突破一百萬份。七十五年，時報新聞周刊創刊，美洲中國時報停刊後所存美金三百萬元，在美創設時報文化基金會，加強中美文化交流，並設華裔子弟獎學金。七十七年，中時晚報創刊，另在國內成立時報文化基金會，資金新台幣一億元，致力公共事務發展。七十八年，復設時報資訊公司。八十三年，美麗佳人月刊創刊。八十七年，新聞藝術創刊。

報紙成功的歷史很短，只有二十四小時，明天不努力，便將失敗。紀忠兄憑他的熱忱，手持一枝筆槍，指揮中時兵團，晝夜不懈，馬不停蹄，打了半世紀的仗。老兵不但精神不減，而且報業日新又新。

中時報系的言論與新聞報導，五十年來，世局多變，不可能沒有瑕疵。但紀忠兄的行事風格，有秉持，有理想，有信心，有魄力，崇尚新聞自

由，維護國家利益，一片丹心，為政府盡積極的言責，書生報國，此所謂國士也。

此篇拙文為紀忠兄壽，致其款款之誠，並盼新聞界後之來者，見賢思齊，知所遵循。

(原載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國時報)

感懷 4 集 新聞篇

遠見與傳播媒體

——紀念先總統蔣公復行視事五十周年

〔一〕小言

中正文教基金會秦董事長孝儀院長、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陳主任委員鵬仁博士爲紀念先總統蔣公復行視事五十周年，訂於本（二）月二十九日在故宮博物院舉辦口述歷史座談會，藉以緬懷蔣公在歷史上的豐功偉業。應邀參加者爲資深黨政軍及學術界人士共二十餘人。筆者被邀參加，因半世紀側身新聞界，只談蔣公對傳播媒體有關事項。謹述下列兩事，以明蔣公對傳播媒體的發展與適應潮流的高瞻遠矚。今日追思，不勝令人敬佩。

〔二〕專業性報紙

民國四十年，筆者接任中華日報社長，當時的新聞界，在台北有直屬執政黨的中央日報，在省有官辦的新生報，民營各報尚未崛起，中華日報處於兩大報之間，發展不易。蔣公身兼國民黨總裁，對黨報的經營，甚爲關切，接任之初，是年六月於總統府召見我時，聽了報告後，便提出建議，認爲台北已有一份黨報，中華日報發展的空間有限。當時中華日報分南北兩版，北版始終虧損，不如南版的蒸蒸日上。蔣公便說，不如

放棄北版，將台南的中華日報南部版，改為專業的「農民日報」。我便坦率的提出相反的看法，說明改絃易轍，將成為地方性的報紙，而且業務採訪各方面都集中在台北，開支省不了多少。蔣公並未堅持他的意見，最後同意我的看法，只說「你去試試看」。此事相隔已將近五十年，歷經世變，到了今天，中華日報的發展，確如當年蔣公所說的放棄北部版，只辦南部版。

蔣公建議將中華日報南部版改為專業的「農民日報」，實屬遠見。民營報興起後，專業性的報紙，如工商時報、經濟日報、民生報、國語日報、大成報等，如雨後春筍，相繼問世，邁向康莊大道。半世紀前，蔣公早已預見及此。

〔三〕 電視

台灣電視公司成立於民國五十一年，為寶島第一家電視台。早此之前，蔣公便已發現這個前所未見的時代新產物——電視，不僅為現代大眾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對社會教育具有實質意義。蔣公認為設立電視台是適應時代的潮流，應早準備。但當時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辭公（誠）卻有不同的看法，認為電視並非當務之急，後經由執政黨中央負責文宣的四組主任陶希聖、中廣公司總經理魏景蒙、及熟識日本電視事業的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啓光等成立小組，負責籌備，拖延年餘，毫無進展。蔣公曾在中常會嚴詞譴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後來蔣公責成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周至柔將軍負責籌劃，始見轉機，並邀久孚碩望的台籍耆宿林柏壽出任董事長。

蔣公的高瞻遠矚，適應時代潮流，促成台灣傳播媒體的發展，重點在於如何貫徹社會教育的功能，希冀有益世道人心，為社會端正風氣。但今日發展的情勢，充滿色情、兇殺、敗壞人倫，亂象環生，蔣公在天之靈，恐亦寢食難安，能不令人感慨係之。

(原載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

公正、公義、公益

——中國時報創刊五十周年有感

中國時報創刊四十周年紀念時，筆者曾以「三種力量的凝眾」為題，撰文道賀。三種力量，即指魄力、毅力、與定力。如今，創刊已屆五十周年，我們欣見三種力量的延伸，為中時報系閃耀了精益求精，無遠弗屆的璀璨光輝。不僅竭盡對政府獻言、對社會服務之責，而且所刊各種專論與報導，篇篇珠璣，也成為廣大讀者的知識泉源。

回顧中國報業的發展，大陸時代，如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北平的晨報、世界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益世報等民營報，都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但以視今日具有五十年歷史的中國時報，深感長江前浪已為後浪所淹沒，兼有駸駸乎後來居上之勢。我們不能不敬佩創辦人余紀忠董事長的領導有方。他的基本精神，雖為書生報國，以讀書人辦報，但擁有所見者遠的眼光，與所持者大的胸襟，為人所不及。他所領導的中時報系團隊，人才之盛，包羅之廣，設計之周，輔以企業化的經營，掌握時代的脈動，足為當代報業的典範。去年（八十八）紀忠兄九秩大慶，他的母校國立中央大學，為慶祝辦報成功，以榮譽博士相贈，這是我國新聞界罕見的盛事。

中國時報對社會的貢獻，最值得我們推崇的是體認報業具有教育的功能，可以端正社會的風氣，傾吐大眾的心聲。或以言論，或以報導，都

能見於公正、公義、公益的立場爲其主導，持以正直委婉的獨特風格。古人以汝南月旦，稱爲品評人物，公允恰當，以視中國時報的堅定立場，包羅萬象，相去實遠。余董事長在美洲中時創刊時，曾自撰社論，以自由、民主、愛國家爲其一貫的信念，益顯其離不開讀書人的本色。平時所舉辦的各種活動，無論學術的、交誼的，都有前瞻性，兼具國際觀的恢弘氣勢，其導向則爲：

——談公正，光明磊落，坦然無私，貴乎不隨不激，不爲外力所困擾。大公報所崇尚的不盲，同樣也可見於中國時報。所以，歷年社論，不乏謀國匡時的諍言。如民國六十八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先後撰文呼籲以冷靜理性、公正公開的原則，審理此案。民國七十五年民進黨成立，力排不報導的建議，復以忠實客觀的原則，發表組黨意見。

——談公義，紐約時報所揭櫫的「無所畏懼，無所偏愛」的宗旨，即我們所稱「勇者不懼」，中國時報便以此精神，伸張公義。如民國五十二年爲張韻淑殺人縱火疑案，不宜率爾定案，連續發表十餘篇社論，終於以無期徒刑定讞。民國七十一年陶百川先生所撰政論兩篇，立委以警備總部內部檢討後，傳將圍剿提出質詢。中國時報即發表「祥和、理性、求團結」爲題的社論，化解此一疑案。

——談公益，中國時報爲公益出力，爲讀者服務，多年來不斷的有新的計畫。民國六十六年增設民意之窗，爲讀者開闢溝通管道。民國八十一年爲原住民少女淪爲雛妓，結合社會團體發起「不許台灣再壞下去」救援運動。爲適應時代潮流與讀者需要，民國八十八年成立中時網路事業發展委員會，八十九年復設「Cmoney 888理財網」，提供服務，展開多

彩多姿的活動，或獨創，或與有關機構合作，活動的領域極廣。中時編輯部並設網路新聞供稿部，竭盡社會教育責任。

我們必須認識的，余董事長除傾其心力辦報外，對致力兩岸和平，多年來有為有識，被視為具有重大影響力人士之一。

有人說，報紙成功的歷史只有一天，也有人說，報紙要成功，必須每天超越自己。顯示報紙任重道遠，不容一天鬆懈，只許進步，不許退步。

否則，便將缺乏競爭力，為時代潮流所淘汰。中國時報對我的情誼，如老友、如益友，五十年來，我們每天見面，每天都有日新又新的感覺，無論內容版面，都充滿著新的生機，新的面貌，新的資訊，彷彿都在超越昨天邁進著，我如沾光似的有一份喜悅，也有一份祝福。

(原載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時報)

經營黨報的辛酸

——為中央日報說幾句話

本月九日中央日報刊載「基層黨員殷盼看中央日報」一則消息，黨員小組組長向章秘書長孝嚴建議免費贈送全國每一黨員小組組長一份中央日報，不禁油然而感。筆者黨齡將近六十載，曾經服務黨營新聞機構十餘年，愛黨未敢後人。

想到與中央日報遷台的淵源，必須追溯到民國三十七年我負責台北中央社的時候，前往南京述職，晤見當年中央日報故社長馬星野先生，馬社長告以中央日報將有遷台計畫，託我在台協助覓定社址及員工宿舍。回台後我便開始進行，後來中央日報在台北市火車站附近最早的社址，與台北市郊的員工宿舍，是由我透過地方人士協助覓定的。三十八年春，遷台後的中央日報，挾有新聞界獨領風騷的聲勢，台灣原有的省營新生報、黨營中華日報，及若干民營報，都有懼於後來居上的感覺。

大陸形勢逆轉，政府遷台，基於大眾關切時局的發展，曾幾何時，民營報紙應運而生，聯合報、中國時報相繼崛起，言論採訪等尺度放寬，都以嶄新的面貌，迎合時代潮流，出現於讀者的面前。黨營報紙則以言論、編採、財務、人事等方面，都因受制於主管當局，礙手礙腳，欲與民營報分庭抗禮，難以著力，日趨衰弱。民國四十年至四十四年，筆者曾任中華日報社長四年，身歷其境，此中辛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報紙解禁後，無論黨營省營的報紙，如談發行，都已很難與民營報紙並駕齊驅。而今黨員小組組長卻希望恢復贈閱中央日報，我認為未為中央日報當前的處境著想，基於忠黨愛黨，深感黨員們協助中央日報提升發行量，群策群力，廣拓銷路，始為正途。因為中央日報當前處於虧損狀態，只有助其擴展，而不能使其增加負擔。

據聞黨營事業主管以中央日報目前經營虧損頗鉅，將有變賣社址、遷至郊區的計畫。筆者既見其盛，復歷其衰，對此轉變，不禁想為中央日報說幾句話：

第一，中央日報具有歷史淵源的背景，過去為宣揚國策與黨義，無論北伐抗戰、台灣重建，每當國家艱危之際，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新生代，或有不詳，我們則以中央日報為榮，希望賡續其既往光榮歷史。

第二，中央日報的航空版，無遠弗屆，對於全球各地區華僑仍有深遠的影響力，華僑關心祖國動態，視此為重要的報導管道，無異僑居地的精神食糧，不可付闕。

第三，中央日報無愧一份最乾淨的報紙，當此社會風氣日趨敗壞，能在舉世滔滔濁流中見此清流，取以移風易俗，有其功能。

第四，中央日報今日欲與充滿都會性聲光奪目的民營報紙爭雄，或有其難，但新聞事業是爭千秋，不爭一時，有其主觀性、前瞻性的價值，不能著眼於短暫的得失。

第五，凡事成之則難，毀之則易，過去代表本黨在海外香港發行的香港時報，即以虧損停刊，至今猶有見仁見智，各種不同的意見。經營雖離

不開企業化的考量，但事關黨的文宣，如因小失大，欲益反損，智者不取，不能不慎。

中央日報的重要性，乃其言論的精闢，本黨李主席登輝先生在中常會曾一再勗勉，深望有關方面除財務觀點外，能為中央日報這塊金字招牌打算盤，勿使其躲在街尾深巷，冷冷清清的過日子。筆者基於多年來對中央日報的愛護，愛之既深，期之尤切，未敢緘默，特就管見所及，作此短文，質諸高明以為然否？

(原載八十八年一月十四日中央日報)

觀念轉變與把握機運

——有感新生報結束營業

報載與台灣光復節同日誕生的台灣新生報，以虧損累累，市場生存空間有限，將於近期宣告結束經營。筆者與新生報建立了半世紀以上漫長的交誼，聞此消息，無限感慨。

新生報的前身，為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所辦的「台灣新報」，擁有十八萬份的發行人數，為一份唯我獨尊的官方報紙，物質條件充裕。台灣光復，規定由行政長官公署接管，改名「新生報」。筆者於創刊之日開始，便參與董事會。所以，新生報的發展，通過歷史的滾滾長河，無不都在我的眼底。過去有它光耀奪目，獨據一方的一面，也有委靡不振，難以抗拒的一面。滄桑之變，今日遭此挫折，如加檢討，不乏足以發人省惕的事例，舉其大者，如：

第一，缺乏企業精神——歷任社長從首任李萬居（第一屆台省議會副議長）至羅克典、謝然之、石永貴諸兄等，其中多有學殖深厚，具有專業修養的才智，但因受省府與議會的牽掣，無法展現專才，一切惟有遵循傳統，墨守成規，將報館當作衙門，無法正視現實，洞察機先，建立企業制度，而於競爭日趨尖銳的新聞天地，雖有充沛的歷史資源，卻未能與新興的報紙一爭長短。歲月無情，人事無常，守成不易，只有迫使逐漸陷於老大窘境，回天乏術。

第二，人事包袱沉重——首任社長李萬居爲典型的好好先生，新生報原有員工，約數百人，李社長在職期間，引用親朋戚友，一年間轉眼超過了一千餘人，形成後來繼任者難以負荷的人事包袱。反觀台灣其他報社，或從大陸遷至，或新創，先天的條件，都不如新生報。但新生報的人事情況，無法取精馭繁，展轉因循，以致影響工作效率。這個包袱，後來日益沉重，阻礙了報社的發展，這是歷任社長最棘手的問題。

第三，漠視根的效用——李萬居社長代表政府接管台灣新報，如富家子弟，得天獨厚。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後，南京中央日報改在台北發行，其他民營報紙相繼崛起。新生報以主觀條件勝人，理應守住本土地盤，獨占鰲頭。但事實並非如此，新生報的發展，顯然受到後來居上的外力衝擊，導致一落千丈。

新生報既屬直營報紙，台灣省府遷至中興新村後，省議會移至霧峰。台中爲大門口，新生報理應跟隨著省府發展，搬到中部。但新生報並未實踐，坐視省方地區的報導，被近水樓台的台灣日報搶盡風光。

第四，留供後人去思——辦報不易，人所共知。新生報最重要的莫過於無法轉變觀念，缺少洞察機先的精神，過於保守，沒有更新的作法，突破上層束縛力，以致難以力爭上流，居安思危，昧於應變，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亦悲乎？

新生報的結束經營，有如老大難以自繼，使我有感於百年老店的中國國民黨，大陸敗退來台後，懍於任重道遠，民國三十八年，成立改造委員會，委員如陳辭公（誠）、黃少老（少谷）、蔣經國、謝求公（東閔）、連定一（震東）等十餘人，皆一時精選，都能痛定思痛，力圖振

衰，半世紀來，每個階段，縱有些微瑕疵，但經濟起飛，民主高漲，社會安定，民生樂利，確有不少的建樹。

此次第十屆總統大選，國民黨何以慘敗，原因頗多，概括言之，就是觀念沒有改變，視黨部為官署，黨工與頭家，仍有距離，只見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其次，則為未能把握機運，發揮帶頭作用，我們須知機運只來一次，稍縱即逝，如不能及時把握，仍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以寬廣心胸，非常手法，大格局，大氣魄，處理當前若干大事，發揮領航作用。所謂浴火重生，可能變為口號。國民黨有根、有基、有人才，前面仍見一片曙光，相信不會走入死胡同，更不會結束基業，千言萬語，今後走向，一切須看黨中先進的智慧，時間不多，火速轉變觀念，把握機運。

(原載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國時報)

平凡的實踐

——潘著《新聞生涯五十六年》讀後感

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前中央日報及中央社社長潘煥昆兄，久臥病榻，令郎名律師潘飛世兄，孝思不匱，將老父於新聞鏡雜誌所撰「新聞生涯五十六年」連載大文，彙印專集，前來請為作序。我與煥昆兄交誼，始於陪都重慶抗戰時代中央社同事，歷經戰亂，迄今將近六十載，兩人在台灣仍服務於新聞界，豈能無詞。

胡適之先生倡導個人撰寫傳記，鼓勵為歷史留下真實的一面，很多學術機構，都邀請當代耆宿一流的人物，執筆或口述，冀以保留當時歷史性的事蹟，或不為人知的秘聞。這種文字，接觸面極廣，但不見於官方史籍，所以，不能單純視為個人所有，當屬歷史巨浪中所衍生的支流。

新聞事業的興起，在中國雖僅一百餘年，但至今屬於歷史性專業而有系統的理想著述，似不多觀。於是，我們只有從新聞界領導人物的回憶錄中找尋這些史料。煥昆兄於新聞鏡雜誌連載大文，就是近年來很難得看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回憶錄，讀來倍覺親切。他的可佩之處，如：

第一，肩負使命感——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日報由馬星野社長負責由南京遷台後，歷任社長為蕭自誠、胡健中、陳訓念、阮毅成、曹聖芬、楚崧秋、吳俊才、潘煥昆、姚朋、黃天才、石永貴、唐盼盼、及現任社長

黃輝珍諸先生，其中有執政黨碩望人士、有新聞界名宿、及青年才俊，都能為業務發展，傾其才智。煥昆兄在中央日報先後服務十六年，民國六十八年接長社務時，民營報業駸駸乎已有凌駕之勢，但他為貫徹其使命感，仍能穩定局面，保持成長，實現彩色平版印報等計畫，且有超前的盈餘紀錄，洵屬非易。迨民國七十年接長中央社後，積極促成電腦發稿，復訂定八項發展業務方針，有猷有為，無不彰顯其對新聞事業之負重致遠。後來他所主持的新聞評議委員會，從被動而為主動，從靜態而為動態，促進新聞界自律，殆亦由於他的使命感所致。

第二，文章如其人——新聞界先進大公報故總主筆張季鸞先生曾以「平凡的實踐」一語推崇中央社創辦人蕭同茲先生的成就。煥昆兄受益於蕭社長的薰陶既久，立身為文，都如受其洗禮。他的文章，樸實無華，實事求是，不以自炫，不以取悅，充分表現了中央社的實踐精神。我與煥昆兄相交甚久，便有文如其人的感覺。

第三，能以一貫之——煥昆兄自稱「新聞生涯五十六年」，一生為新聞事業奉獻，一心一德，這是儒家以一貫之的傳統精神。新生代，如能細讀其文，當知見賢思齊，奮然起而自勵，屏除那些朝三暮四、見異思遷的雜念。

煥昆兄主管新聞事業，始於中央日報，終於中央社，兩者對煥昆兄都有他的歷史淵源，中央日報過去為政治大學校友薈萃之所，濟濟多才，煥昆兄充分的發揚政大精神。中央社則因蕭社長所領導的團隊精神，以德待人，廣受薰陶，煥昆兄始終為一實踐者。兩者都可視為力量之源。

(原載八十八年元月三十日中央日報)

歐陽冠玉兄書簡序

古今中外，歷史上各種人物在他們所留下的那些著作，無疑的，當以書信與日記，最具真實性，也最能流露情感。原因是作者出於內心的反應，未加掩飾，未加保留，很自然的傾吐真情實話。這些人物包括名傾一時的政治家、社會名流、作者及從事文字工作的新聞記者。書信與日記，在眾多著作中就是有別於其他創作，有其更可貴的一面。

讀者們基於從此可看到作者未經化裝的真實面目，與存在於內心的隱蔽世界，有時如發現某種隱私似的滿足，供其深入研討。清代如曾國藩、左宗棠，近代如嚴復、蔡元培、梁啟超、胡適等學人，他們都有書信或日記之類的著作，流傳於世，爲人所重視。

旅美資深記者續伯雄兄最近將其與「新聞鏡」周刊故創辦人歐陽冠玉（醇）兄近三十年往返的書信，加以整理，附以日記，計畫出版單行本，內容已超越個人的見聞與生活縮影，誠爲新聞界罕見的盛事。冠玉兄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不遺餘力。從抗戰勝利後，參與「新聞天地」雜誌開始，所撰大文，即以立場嚴正，分析明晰，實而不華，幾無虛筆，爲人所不及。來台後，先後參加台灣新聞報、中國時報、自由日報領導行列——曾任中時副社長、自由日報社長、「新聞天地」、及「旅行雜誌」駐台代表、「文星雜誌」主編，離不開如椽之筆。其間復在政大、師大、文化、世新等大學兼課，對於新聞事業的發展，與政治、社會的演變，鉤元提要，掌握重心，無不瞭然於胸，教以致用，爲青年學

子所嚮慕。

這部鉅編，全書已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新聞鏡」周刊第五一三期開始連載，內容係冠玉兄在民國五十六年至六十七年，累積十二年所寫給在美國的續伯雄兄的書信，其中涉及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發展的脈絡，及傳播應盡的職責。字行之間，冠玉兄的正直不阿，純樸真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而伯雄兄有條不紊，將冠玉兄三十多年的信稿，如同歷史素材，予以珍藏，絕非易事。可惜「新聞鏡」周刊已於本年（八十九）停刊，走入歷史，依據原來計畫，全書尚有十八年的書信，未及整理刊出，誠屬遺憾。

親友們爲使竟其全功，冀以爲新聞界留此不可多得的史料，特將未經刊出的部分信稿，連同已經連載部分，共計六十萬字，由冠玉兄的門生黃君儀小姐，加以整理，彙編成書，並訂於本年十月六日冠玉兄逝世三周年紀念日出版，分贈各方人士，用意至善，而冠玉兄一生志業，亦得與此書共存而不朽。

夏龢嫂夫人伉儷情深，感念冠玉兄一生對新聞事業的貢獻，功不自居，特將編印此書始末見告，囑爲之序。追懷冠玉兄爲新聞事業而奉獻的一貫精神，既感其事，復思其人，豈能無一詞以贊，因勉而書之。

（民國八十九年仲夏於台北市）

寫出時代的女記者

——黃著《記者生涯與真實人生》序

一位成功稱職的傑出新聞記者，他的學養，必然像運動場上的全能選手，無所不能，不僅擁有睿智的領悟力，正確的觀察力，也須有敏銳的反應力，知識面極廣。如只憑寫作能力，他的表現，僅見於單線上的才華，不能稱為全能。百年以來，我國的新聞界，曾出現不少傑出的記者，留下為人所讚賞的作品，對新聞事業而言，很少能一以貫之，終其一生為記者。如求之名副其實的全能記者，自然也就戛戛乎難見了。

女性記者，能以全能見稱，更是鳳毛麟角。大陸時代，抗戰以前，記者似屬男性的專業，抗戰軍興，漸有女性投入記者行列。中央社便有陳香梅女士，她雖有一支生花妙筆，但記者生涯在她從昆明到戰後的上海，時間很短，驚鴻一瞥。與她同一時代，尚有中央日報的徐鍾佩女士，為女記者中翹楚。她寫得一手好散文，從倫敦寫到台北，超乎以記者之筆，寫出很多感性的精彩文章。可惜政府遷台以後，如大隱在朝市，令人遺憾。台灣光復，早期女性的記者，並不多見。遙想當年，培育於此，成功亦於此的女性記者，至今仍為眾所矚目的新聞界人士，而且恢恢乎具有全能的才識，黃肇珩女士當為此中首屈一指。

肇珩女士自幼隨家庭避亂來台，於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以第一名畢業的輝煌成績，進入中央社，由實習記者而正式記者而新聞部副主任而

主任，先後共達二十年。她秉承中央社平凡的實踐傳統精神，於己則掌握以誠與勤，全力投入，於公則求超越，追求最完美的境界。尤可貴的是擔任記者時，採訪各種不屬於同一類型的人物、事物，憑她求是、求真、求美的責任感，闖入陌生的世界，取材謹慎，觀察入微，運用流暢之筆，所完成的報導，充滿著親切感、真實感，極有深度。採訪工作，或投艱，或嘔氣，情所不免。但她不自餒，鍥而不捨，處之泰然，終於在萬人如海的繁複工作環境中，以精誠所至建立了寬廣的人脈關係，從政府大老級的人物如張岳軍（群）、王岫廬（雲五），到學術界泰斗胡適之、趙元任、林語堂、吳大猷、錢賓四（穆）、梁實秋等顯著人物，不僅都能坦誠相見，而且從他們對後輩的提攜與賞識中，也獲得了不少珍貴的啓示。當年中央社馬星野社長，派她兼任由美返國的林語堂秘書，協助編輯林氏漢英辭典，得力頗多，絕非偶然。後來還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編寫了一部輝煌不朽的鉅著《一代人師——蔡元培傳》，榮獲國家文藝獎，這是司馬遷所說的名山事業，傳之百代。

肇珩女士雖為一傑出的女性，但她認為「你在工作時，忘掉你是女性，回到家裏，記住你是女人」，並不欣賞世俗所稱女強人之類的名詞。

肇珩女士一生對新聞工作情有所鍾，民國七十年，國民黨文工會以她在中央社已有卓越的表現，邀她出任中華日報副社長，越二年，擢升為社長，業務由虧轉盈。繼以出任正中書局總經理，憑她的才智，帶來朝氣與活力，膺選為出版業前所未有的六年兩任女性理事長。民國八十二年，被提名為二屆監察委員，榮登這個又與新聞工作截然不同的官階，展其才華。但肇珩女士所喜愛的還是新聞工作，自稱有被割捨的感覺。

肇珩女士最近將進入新聞界到離開監察院，以自傳式的文字，寫成《記者生涯與真實人生》一書，這是上乘的報導文學，從她的心路歷程到實務涉練，以不同的角度加以深入剖析，細細道來，呈現著社會的百態。它所涵蓋的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一角，凡是屬於這個時代的人，都應細心的鑒賞。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慶日前夕)

感懷 4 集 時事篇

走過台灣53年

今年十月五日是我到台灣五十三周年的紀念日，五十三年前的今天，我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由陪都重慶搭乘專機，經上海直飛台北，這是政府有關人員於抗戰勝利後最早一批到達台灣的人員。同行者五十多人，歷經滄桑之變，除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將軍及嚴家淦、黃朝琴、李萬居、王民寧等先後作古外，至今健在者，據知只有僑居美國的范誦堯將軍（前進指揮所副主任）及前國大代表林忠等數人而已。

筆者當時以中央社特派員身分來台，負責向國內外報導台灣光復後的消息。面對這個被日本統治半個世紀，淪為殖民地的祖國國土，說不盡的欣奮，也說不盡的感慨。繼以大陸形勢逆轉，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神州陸沉，各方紛紛避亂前來，大局未定，人心惶惶。台灣由百廢待舉的戰後社會，到處廢垣殘壁，物質匱乏，有待政府重建的時候，卻轉變而為風雨飄搖，處境艱危，孤懸於海外的堡壘。所幸政府能勵精圖治，生聚教訓，集中各種資源，包括來自大陸的財力人力，積極為重建台灣而努力，而台灣各界都擁戴政府的決策，群策群力，朝野形成一股充沛的新生力量。三七五減租農田政策實施後，逐漸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社會，終於導向經濟起飛，國際視為奇蹟，為中華民族創造另一歷史的新頁。台灣的社會，乃由動亂而安定，安定而繁榮，充滿多元化的燦爛光彩，以至今日。

所不幸者，為光復初期，在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主政一年半期間（三十四

年冬至三十六年夏），不諳民瘼，剛愎自用，演變成二二八事件慘劇，引為千古遺恨。

五十三年來，風雲詭譎，變化莫測。整個世界在變，大陸在變，台灣也在變。國際在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唯一強勢的大國，大陸從經濟政策改絃後，也在改變。尤以兩岸開放後，為台灣帶來了前所未見的衝擊力，探親攬勝，絡繹於途，應接不暇。台灣自解嚴後，民主的浪潮，如山洪喧騰，淹蓋了整個多元化的社會，從國會殿堂到街頭，拍案驚奇之外，加以暴力，以致綱紀盡廢，秩序紊亂，凡此種種，我們歸咎何人？居於此，愛於此，當年來自大陸的人群，誰能在他的故鄉比在台灣住得更久？五十三年的情懷，對筆者來說，故鄉無此感受。遙想明末飽學之士沈斯庵等人，終老於此，誰還能不認同這塊土地，談什麼族群省籍？個人基於在茲念茲，身歷五十三年的變遷，感時撫事，被良知所驅策，提出幾點願望，就教於高明：

其一，提升國家的理念——什麼是國家理念，一般新新人類，或許意識模糊。台灣光復之初，人人以回歸祖國，自稱中國人為榮。三十四年，政府接管工作未開始前，某校日籍教員以支那人相稱中國人，便為學生起而反抗。代表國家的國旗，台灣的天空，第一次飄揚起來的是筆者抵台的次日（三十四年十月六日），前進指揮所在台北賓館舉行升旗典禮以後，從此到處爭購國旗，旗店成為最賺錢的熱門行業，家家戶戶，高懸國旗，有倒掛的，也有自縫的。這種愛國意識與熱忱，無疑的都是出於真誠。不料如今卻有人任意焚燬國旗，每逢國家盛典，國旗也不懸掛。如何提升國家理念，這是一個嚴肅問題，希望有關當局，勿以河漢

視之。

其二，行事須有大格局——經國先生健在時，曾鼓勵青年們要挺起胸膛，開大門，走大路，就是指格局而言。一個人立身行事，必須具有寬宏的胸襟，遠大的眼光，始能不至於侷促一隅。心地狹窄，必然自陷困境。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是相互排斥，反對異己，談不上寬容。所以，政壇上很難塑造從大處想、大處看、大格局的典範人物。歷史上如唐太宗，能將魏徵化敵為友、納為己用，提供不少匡時的逆耳忠言，這種有容乃大的器度，我們能見之否？

其三，速重整道德教育——科技掛帥後，上至國防，下至遊樂場所，無不藉科技之能，日新月異，各擅巧思，展現各種令人瞠目稱奇的時代產物。可惜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文明與道德，失去平衡發展，一般人只知崇尚物質，忽略了精神的充實與滋養，只知攫取，漠視道德行為的失常。道德繩準不再成為維繫人心的屏障。於是，社會倫常觀念，蕩然無存，殺人放火逆倫，無惡不作，層出不窮。科技犯罪與教改，不成比例。誰能救救我們的社會，救救我們的後代。韓愈所呼籲的「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筆者渴望能有這類的濟世人物出現，實踐心靈改革。

光復初期，筆者每到台北近郊鄉間走訪，所見男的大多滿口金牙，女的一雙爛腳，行走於田畝之間，冒風雨，勤耕種。而今各地鄉村，男女博士學子滿街走。單以彰化縣鹿港鎮來說，數萬人口中，博士佔了幾十位，教育水準愈高，顯見人才愈多，何以道德水準不能跟進？家庭教育之錯，學校教育之錯？抑社會教育之錯？筆者百思不解。

其四，落實政府公權力——台灣光復之初，雖在浩劫之後，但因日本高壓統治的關係，公權力做得很徹底，尤其日本警察，手握公權力，台灣老百姓多不願叛逆。所以，當時曾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傳說。光復後，日人被遣回國，政府青黃不接，警力削減，罪犯日增，為社會製造不安，治安反而不如過去。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後，因處於戒嚴期間，特別重視社會秩序。如今，解嚴以後，號稱「民主之窗」的寶島，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公權力已面臨考驗。在諸多民代的面前顯然已被僵化，政府的良好政策，執行起來，既已打了折扣，充滿著無力感，頭家也只得長嘆。尤其選風所至，一切泛政治化，許多人的臉孔都變了色，變了形，是非顛倒，真理莫辨，公權力唯有站在一旁。此非司法機構處理不嚴，警察執行不力，而是特殊阻力，如觸礁一般，徒喚奈何。須知公權力不張，對守法者極不公允，而對政府威信的損害，更是難以估計。

這裏，筆者聯想到顧亭林的詩：「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此時的心情，正復如此。台灣與大陸的距離，彷彿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無論歷史、地理、文化、經濟，都有密切關係，非比尋常。但我們目前必須瞭解台灣處境，認同二千一百萬多人的心願，策勉大家走出去，走向世界，走出自己的路。目前兩岸已經進行交流，我們所期望的和平統一，一時雖無法實現，國統會所訂的遠程計畫，仍可寄望於未來的歲月。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乏離與合，不是沒有戰爭，而是屬於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平為人人所崇尚。和平統一，不須愁日暮，終於期待有實現的一日，無任馨香以禱祝之。

(原載八十七年十月四日中國時報)

林森與陳儀

——從紐約蔣夫人用品拍賣會購畫談起

名記者陸大聲（鏗）兄以美金一千二百五十元自紐約競標購得蔣夫人用品中的國民政府故主席林子超（森）先生一幅油畫像，頃已攜回台北，並定於本月十六日邀約新聞界友好共同觀賞。此畫繪於抗戰陪都重慶時代，林主席長髯的儀容，望之儼然。大聲兄的義舉，不禁鈎起了我很多懷舊的情感。

林子超先生，民前四十四年（一八六八）生，民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去世，其故里福建閩侯青芝山，饒泉石之勝，因人以居，自號青芝老人。他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前後十二年，自「一二八」「八一三」以至「七七」之變，均曾身歷其境。震盪全世界之西安事變，負重憂國，共赴艱危，蔣委員長得以專心致力抗建大計。林故主席外則澹泊寧靜，內則沉潛致遠，無私無我，其典範足以垂千秋而不朽。

林故主席於民前十四年（一八九八），自閩來台，曾任嘉義地方法院通譯，實則隱蔽其身，致力於革命工作，將及一年。故與台灣亦具有歷史的淵源。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閩變平定後，陳公洽（儀）銜命由南京至福州，主持福建省政，長達八年，建樹頗多，然以剛愎成性，招致各方不

滿。林故主席於陳公洽接任時，曾推荐高登艇、鄭貞文，參加省府的團隊，二人俱為閩籍，高氏曾任監察委員，鄭氏為名教授，曾編著化學教科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皆望重一時。當時高為民政廳長，鄭為教育廳長，省府陣容，只此二人為閩籍，其餘嚴靜波（家淦）、徐學禹、包可永等，多屬江浙兩省人士。這批人馬於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後，陳公洽為行政長官時，幾全部移師台北為公署高級要員。陳公洽的地域觀念，因此為人所垢病。

陳公洽主持閩政後，各縣縣長異動，由主席親自下令，廳長高登艇瞠目以對。省立各校校長人事異動，鄭廳長亦事先無所悉，一時傳為佳話。

當時林故主席曾榮歸故里，陳公洽雖行禮如儀，親至機場相迎，但場面甚為冷淡。

福州英華書院，為美國美以美教會所創辦，歷史悠久，現已有一百餘年，頗著聲名，為筆者母校。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林故主席返閩時，適逢英華創校六十周年紀念。林故主席與曾任海軍總司令及福建省主席的楊樹莊，亦為英華校友，巧合的都因早年從事革命工作被退學。校長陳芝美博士以校友為貴，二人均屬紀念會被邀的貴賓，且尊為座上客，獨省主席陳公洽未光臨。

由觀賞林故主席油畫像談起，拉雜以成此稿，或可充為閩台關係史軼聞。

（原載八十八年三月十三日中國時報）

李登輝先生的期許

——培育人才與調整做官心態

連永平（戰）先生於中國國民黨十五全代會當選主席後，即率領副主席蕭萬長、吳伯雄、王金平、蔣仲苓、林澄枝及秘書長林豐正等前往慈湖、頭寮分別向總裁蔣公暨蔣主席經國陵寢致敬，然後轉往李前主席登輝處請益。

登輝先生語重心長的提出兩點意見，一為重視人才，發掘人才，培育人才，未來任何選戰，才能勝選。二為調整做官心態，做官的怕多講話，遭受批評，怕做錯事丟官。國民黨現為在野黨，應放棄做官心態，放下身段，接近民眾。善哉，登輝先生的期許，一針見血。

登輝先生受命於民主聲浪洶湧之際，出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面對國內外變局，風風雨雨，十二年來，褒貶功過，將來歷史自有定論。不過，國民黨百年老店的經營權，是在他主政時喪失，此一重大挫敗，自難杜塞悠悠之口。

關於人才，回顧國民黨過去所培育者，從穿草鞋到側身廟堂，不謂不多。放眼當前的政壇，從國會到各政黨，那些折衝壇坫的頂尖人物，由親民黨到新黨，幾乎十九出於國民黨的大門，即民進黨若干精英，也喝過國民黨的奶水。多年來的演變，人才外流，不但不為國民黨所用，反

而積怨日深，鴻溝高築，力量分散，無法為黨而團結一致，爭取勝選，其中原因，固然不少，但「誰為為之，孰令聽之」，今日如加檢討，領導階層的胸襟是否不夠寬？度量是否不夠大？視野是否不夠遠？國民黨今後如果不能以弘大寬廣的格局，敞開大門，用人唯才，則所謂培育人才，恐將變為「人才訓練所」。

至於調整做官的心態，說來容易，做起來就難了。筆者來台五十餘年，大官小官，閱人多矣。有的官未上任前，就有官氣，有的官在任時，官架十足，卻少人味。有的下台官，官氣依然，官味猶存。但也有為官者，保持人味和骨氣，堅守原則，不至隨波逐流，究屬鳳毛麟角。林林總總，如能傾其所見所聞，足以寫一部現代官場現形記。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光復節前一日，在萬民歡呼中，台灣行政長官陳公洽（儀）由南京飛抵台北。他在松山機場記者招待會上說：

「我到台灣是來做事的，不是來做官。」他在公署寶座坐了一年半，不接近民眾，不知道民怨，三十六年終於發生「二二八」慘劇，這是做官的遺殃。

國民黨十二條青年守則，冠冕堂皇，其聲鏗鏘，每月或每週集會，濟濟一堂，高聲朗誦，但能以力行實踐者，究有幾人？而任黨務者，動輒以官自視，民眾看黨部如衙門。黨之與民，自然脫節，愈走愈遠。登輝先生身歷其境，洞察做官心態，足以扼殺黨的生機，可謂灼見。

國民黨今後改造的轉機是「起而行」，非「坐而言」。我們大道理說得太多了，切盼少說話，多做事，空話不要說，廢話更不必說。

連主席於上週改選後第一次中常會勗勉各委員，今後要「苦民所苦，樂

民所樂，疾民所疾」，方向正確，希望秉此大原則，不猶豫，不鄉愿，向前邁進，這是一個國民黨老兵的呼籲。

(原載八十九年七月四日中國時報)

光復節的傷感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五十三周年紀念日，屈指將屆，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首先，光復的意義，如今已爲人普遍的漠視，甚至有人將「光復」兩字改稱爲「終戰」，「終戰」是充滿日本情調的文字，中國字彙中只有「停戰」，從未聽過有什麼「終戰」。而且，台灣光復，我們是戰勝國，日本是戰敗國，我們如自稱爲「終戰」，豈非將主動與被動倒置，好像我們在發動戰爭。歷史上如有此錯誤，傳之後代，真是是非顛倒，將爲千古罪人。

再說，台灣光復節是日本在台灣地區向我們投降的紀念日，這是我們抗戰八年，傷亡四千餘萬人換來的，根據民國三十二年開羅會議宣言及三十四年波茨坦會議聯合公告，日本佔領的台灣必須歸還中華民國。所以，當時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參加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台灣受降典禮，就是代表日本向我們投降，並不是什麼「終戰」。如今，參加受降典禮的台灣碩宿，如省議會首屆故正副議長黃朝琴、李萬居等人，都已先後老成凋謝。筆者有幸，躬逢其盛，而今以垂老之年，看到新生代，對於過去這段有關台灣存亡的歷史，不僅印象模糊，甚至全然不知，加以精省在即，世事變遷，將來的演變，難免杞人之憂。

歷史不可廢，也廢不了，縱然民主高張，經濟起飛，科技猛進，台灣現

況已改變了一切，但是，我們決不能不知自己的歷史。回想光復之初，萬眾歡騰，慶祝台灣重入中國版圖，人人以自稱中國人爲榮，誰料今則適得其反，有些人不願自稱爲中國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似未廣受薰陶，缺乏崇高的民族愛。我們的歷史在那裏？新新人類，難道真的良知已昧，數典忘祖，連自己的根在那裏，都不去理會。先哲有言，亡其國者，先亡其史，思之能不傷感。

當年魯迅看到社會風氣敗壞，憂及下一代，曾撰文呼籲：「救救我們的孩子們」。如今，我們面對著光復節，不知飲水思源，也要同樣的呼籲。

(原載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

一個台北老市民的祝福

——兼柬馬英九市長

喧騰多時的台北市長選舉，終於塵埃落定，馬英九以七十六萬六千多票高票當選，台灣政壇，瞬息之間，風雲變色，成爲國際爭相報導的重大新聞。抗戰勝利後，筆者來台已將逾五十四年，忝爲台北市老市民之一，居於此，憂患於此，歡樂亦於此，關懷台北市的動態，情同鄉土。當此馬市長蒞任前夕，特就觀感所及，謹以祝福之心，略貢一得之愚：

第一，馬市長以高於在職市長陳水扁將近八萬票（以七八三〇二票超前，得票率五一．一％），誠非易事，由民進黨執政四年的台北市，失而復得重歸執政黨懷抱，此對企圖邁向執政之路的民進黨，不僅頓遭挫折，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從分庭抗禮到轉變，國際輿論的批評，以至中共的反應，都驟然改觀，情勢的發展，對執政黨無異一帖補藥。

第二，台北市民對馬市長的擁戴，其來有自，一則由於馬市長個人因素，具有清新拔俗，有異於官場積習已深的官僚形象。一則由於執政黨多年來深感政壇失勢，選舉落敗，爲力挽狂瀾的積極意識，凝聚一股難以抵禦的團隊力量，終於扭轉頹勢。

勝選靠選票，一張選票一份情，七十八萬張選票，就是七十八萬人情債，中國人素重感情，老台灣人或新台灣人，也不例外。古今中外，歷

史上多少人物，往往不知善用感情，終於成爲感情俘虜。筆者亟盼擁護馬市長的選民，不但不向馬市長討回人情債，還希望化擁護爲力量，爲建設市政邁向巔峰。

第三，未投馬市長的票，而繼續支持在職市長陳水扁的選票，亦高達六十八萬八千多票（六八八〇七二），基於都是愛護台北市的市民，當以台北市之榮爲榮，台北市之辱爲辱。而馬市長一向主張超黨派，組成小內閣，一切當以市民福祉爲依歸。筆者希望過去反對者，而今都能無分彼此，集中力量，爲台北市新的建設，共享共樂。

第四，馬市長蒞任後，萬方矚目，宵衣旰食，不難想像。筆者過去對當選市長的希望，曾談到「格局要大，眼光要遠」（見本年六月十七日中國時報）。六十年前，吳鐵老（鐵城）出任上海市長時，豁達的胸襟，寬廣的眼界，爲各方所讚賞。一個理想的市長，便當如此。馬市長主持市政，當有此宏觀，看得遠，想得深。經國先生所說的「開大門，走大路」，就是這個意思。

第五，建設台北市具有國際水準的都市，當爲二百五十多萬市民共同的期待。

民國二十四年，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年，舉辦博覽會，自炫其在台建設，總督中川健藏邀請福建省故主席陳儀來台參觀。當時筆者躬逢其盛，與福州英華學校畢業班同學同時來台旅行，所見只有大龍洞的孔廟、萬華的龍山寺，及植物園、動物園等處，可供瀏覽。事隔十年，第二次來台，則爲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台北市歷經戰火浩劫，到處斷垣殘壁，總督府（即今總統府）形同廢墟，供人憑弔，全市人口僅二十五萬

人。而今台北市人口高達二百五十九萬人，儼然成爲國際性大都會，如故宮博物院、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圓山大飯店等處，建築之美，堂皇典莊，早已揚名國際。我們寄望於馬市長者，類似建築，無論藝術的、科技的，如能多添幾處，便可與世界各大都會互爭長短。

第六，前任市長陳水扁，盛年有爲，風評有毀亦有譽。質言之，他爲台北市建設，確曾花費不少心力，改變不少市民的感受。馬市長兼具包容寬厚的政治人物風範，當知施政有其踵事增華賡續的重要性，爲台北市的建設，益增其無限的光彩。筆者在台北市半世紀，由第一任市長黃朝琴開始，先後十六位市長，每位都有交往，深知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艱辛。

每人每日作息的時間，只有二十四小時，馬市長亦不例外。他當前的處境，千頭萬緒，加以三黨不過半的市議會，與二百五十萬市民殷切的期待，疑難雜症，無日無之，艱辛可知。筆者久欽馬市長的才華學識，謹借中國時報的篇幅，敬贈馬市長「信任部屬，提綱挈領」八字，如此即可舉重若輕，自由自在，願台北市政從此揭開新的一頁，無任祝福以企待之。

(原載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

法務部長難為

法務部長在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中過去若干年並不是最顯眼、最風光的一職，但他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與所負的責任，並不亞於任何一位首長。尤其是法治國家，公權力能否貫徹，輿論都將歸究於法務部。所以，他的褒貶，不是一時，而是千秋。我們對於一位有才識、有作為的法務部長，應給予肯定。

日前，偶晤城仲模部長，談到最近水患問題，群起責難政府的防護不力，戚然而憂。他認為以台北地區為例，國土遭受人為的破壞多達一百多處，一旦颱風壓境，洪水暴發，救難自然措手不及。所以，他不辭辛勞，奔波於災區或危險地帶，實地勘察，看看我們的國土，究竟被人損害到什麼程度，如何追究法律責任。這種為國為民，痼瘵在抱的胸襟，令人激賞。

我們於此，不禁想到法務部長難為，前兩位部長，馬英九處心積慮的進行查賄、肅貪及反毒工作，建立法制，確有不少創意，希望能為社會端正風氣，大眾對檢察官們的觀感，能有所改變。但是，曾幾何時，他的理想，雖有人鼓掌推崇，但無法突破現實的環節，終於掛冠而去。

前任部長廖正豪的治平掃黑行動，鏗而不捨，勇往直前，同樣的為社會大眾所期許，但是，威脅等陰影，隨之而至，法務部雖因他的執著努力，在國會中獲得多數的肯定，可惜環繞著他仍有一股阻力，好官只能

讓他走入歷史隧道。

如今，城部長為愛護這塊土地，不計名利，不怕黑道恐嚇，置死生於度外，具有強烈的使命感，看到各種亂象，認為如不迅謀治本對策，追究禍根，繩之以法，將使我們的社會永無寧日。寶島各處每日發生的大小刑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非區區少數現有五百餘檢察官所能逐一應付。教育再造，心靈改革，應負起最大的責任，風氣所趨，不往金錢看，不為聲色誘，應以道義為先。城部長每日雖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個人力量，恐亦有限，法務部長難為，可想而知。

(原載八十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國時報)

讚許信良賢伉儷

——一頁民主教育好版本

本（八）月一日，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林義雄舉行移交典禮，適為高雄市民進黨議員林滴娟在大陸遇害傳到台灣的次日。突來噩耗，晴天霹靂，群情激憤，當可想像。部分獨派人士，卻遷怒許信良主張的「西進政策」，手持兇器，高喊「台奸」，大吼大鬧，其中一人，衝向許信良，向他的臉部重擊一拳，迅見瘀血。其夫人鍾碧霞及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的司機辛進財同時受傷。充滿暴力，駭人聽聞。反觀許信良的表現，異常鎮定，始終保持著他的風度，並說「這種事情，對他來說，稀鬆平常」。臉上雖受傷，還是參加移交典禮，不還擊，也不訴之法律。政治家成功的起碼條件，就是寬容待人。

許夫人鍾碧霞是日下午召開記者會說：「長期以來，民主是大家奮鬥的目標，如果不同意見就動刀動槍，台灣的下一代要怎麼辦？」她在電視上又表示：「政治理念，如有不同意見，應該公開辯論，共同研討。」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吃這行飯的人，一舉一動，影響所及，都須對下一代子孫負責。

半世紀來，台灣多少紛爭，無不藉民主之名，行暴力之實。生活在台灣的人，恐都有此慘痛的經驗。范仲淹以「政通人和」，稱讚政治的修明，乃見祥和之氣，社會得以安定。許信良賢伉儷，此次被毆事件，筆

者認為是民主教育的一頁的好版本。

(原載八十七年八月七日中國時報)

談走出去

年來在報章上常常看到「走出去」一語，流為大小官員及民間領袖口頭禪。大丈夫立身處世，應有此抱負，在困境中衝出一條康莊大道。走出去的真正意義，並非要我們走出去，落得橫衝直撞，頭破血流。而是要我們不可自我封閉，孤陋寡聞。韓愈所謂「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我們如老是坐在這個像井似的寶島，看到外面的空間便說小，自然非走出去看看不可。

走出去，語重心長，立意未可厚非，對我們來說，充分的具有前瞻性，不能視為如東風過耳。否則，看不到外面風雲莫測，變化無窮的世界，惟有陷於唯我獨尊，妄自菲薄，自欺欺人，導致心胸狹窄，眼光短小，那些因蔽塞所造成的故步自封，閉門造車等病態，不一而足，難以自覺。

西方學者過去曾批評我們的民族性，患在太過保守，以萬里長城為例，就是只求自保，缺乏主動衝刺的象徵。此說筆者不敢苟同，歷史上最為人所熟知的如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都是具有衝刺性，非有冒險犯難的精神，不能為之。那個缺乏交流的時代，這些歷史人物，胸襟何等寬廣，眼光何等遠大，以視哥倫布、麥哲倫之流，並不遜色，也可說這是古人留與後代「走出去」的典範。

如此看來，「走出去」，並不始於今日，今日世界，天涯若比鄰，空間

已縮小為地球村，我們如還是侷促於一隅之地，缺乏世界觀的視野，仍然圖一己之私，斤斤於你爭我奪，不能挺起胸膛，張開眼睛，往遠處看，往大處想，自我陶醉於台灣經驗，經濟奇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恐今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才是真正的悲哀。

(原載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自立晚報)

薑是老的好

——談政治人物的年齡

談年齡，對女性來說，就像向報館老闆問發行量一樣，很敏感，也是忌諱的一件事。這裏，筆者聯想到政治人物的年齡。

半世紀以前，大陸時代，很多國民黨重要人物，如張岳軍、吳鐵城、黃少谷、陳立夫、魏道明、吳國楨、葉公超等人，未到三十歲就已頭角崢嶸，為大眾所矚目。那時期並沒有所謂「青年才俊」的聲浪。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後，歲月催人，時不我與，政壇上彼此都不願談年齡。

關於年齡的秘密，有三個有趣的故事：

其一，立法院隨政府由大陸遷來台灣，通訊錄上立委除姓名外，照例有籍貫、年齡、性別、住址，開始登記時，樣樣俱全。歲月不饒人，若干女立委就向秘書處要求，重印時，年齡不要更改，時日愈久，芳齡不可能年年十八，以後索性將年齡一欄取消。

第二，民國三十六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平定後，中央政府派魏伯聰（道明）來台接替行政長官陳公洽（儀），出任省府主席。所發表全省縣市長，不乏年輕精英，其中有一位年過六秩的高雄市長黃莫京（強），曾任抗日著名的十九路軍參謀長，廣東人，為故司法院長王亮疇（寵惠）推薦與魏主席。黃市長最怕人問他的年齡。某日，有一青年人問他貴

庚，黃市長答稱：「請問你問我身體那一部分？」該青年一臉愕然。黃市長復強調：「我從頭部到腹部，年齡各有不同。」該青年臉紅，此則問答，頓時傳遍港都，從此無人再請問黃市長高壽。

其三，故國大代表情治界前輩李學詩，與劉壽公（安祺）老將軍同庚，也不願談年齡。某夕餐敘，同席有一年輕人問他貴庚，李代表拍拍年輕人的肩膀說：「老弟，老弟，像你這樣的年輕，我已沒有希望，像我這樣的年歲，恐怕你也沒有希望。」語雖詼諧，但極戲謔，年輕人聞語，爲之靦腆。

以上三則故事，可爲笑林廣記增添新的一頁。筆者由此領悟到政治人物的年齡，固可隱瞞於一時，不可能隱瞞於一生，等到壽終正寢，訃文所載，終將真相大白。天下事往往類多如此，歷史上古今多少英雄，如憑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最後其不大白於世者幾希。

年老，人之常軌，生老病死，誰也逃脫不了，但到晚年，總要活得有意義，有風度，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尤其是政壇大人物，必須提供豐沛的閱歷，以寬廣心胸，包容器度，與深遠見識，傳之後代，成爲世代交替的助力，而非阻力，樹立大政治家的風範。反之，如到老境，仍然昧於現勢，爲功利所惑，智不及急流勇退，韜光養晦，拿得起，放得下，將成千古遺恨。

不久前，對台灣民主政治綽有貢獻的李總統登輝先生，於辭卸國民黨主席時，曾比喻薑是老的好，薑是愈老愈辣，李總統老而彌堅的旺盛精神，令人欽佩。

筆者不才，年逾八十，薑雖老，但不辣，平時喜學蘇東坡「忘懷盃酒逢

人共」的曠達，閒時寫些不足掛齒的短文，騙取稿費，假日則陪老伴登山觀景，娛此餘生。天下事，久不聞矣。

(原載八十九年四月三十日中國時報)

能甘寂寞

——政治人物應有的涵養

政治人物的講話藝術，成敗在乎拿捏分寸，不多一句，也不少一句。尤其見於折衝壇坫，運用得宜，往往令人讚歎叫絕。古代如藺相如之於澠池會，張子房之於鴻門宴，近代如外交元老顧維鈞之於巴黎和會，蔣廷黻大使之於聯合國大會，都能憑他們講話的才智，化解危局。但也有人以多言，喋喋不休，不爲人所喜，反而產生負面效果。這裏，特以半世紀來台灣政壇的兩例，追記如左：

其一，台灣光復之初，很多婚禮都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並請台省文獻委員會首任主委台籍耆宿黃純青爲證婚人，黃老德劭學豐，爲各方所重，但愛講話。某次婚禮，致詞將近一小時，從祖先由閩如何遷台及當前成就，光宗耀祖，鉅細無遺。新郎新娘，久立不支，賀客不耐，陸續散去。後有親友婚禮，便避免請他證婚。某次，黃老往中山堂賀人婚禮，以未能當上證婚人爲怪，當司儀於婚禮進行時，宣讀貴賓致詞，他就應聲上台，賀客見此場面，都悄悄離去。此老的疲勞轟炸，其威力真不小。

其二，故反共亞盟及世盟理事長谷叔常（正綱），爲國民黨反共大將，黨性強，活動力超越常人。有人戲稱，谷老晨起必先問左右，今日有無會議，有無訪客，是否需要赴機場接送顯要。如答以都免，谷老臉色就

難看，似有失落感。谷老每次演講稿，必通過國民黨文宣單位，轉知各報全文刊載，並要求社論配合，發表慾之高，可想而知。

據聞，某次世盟在台北集會，谷老對各國外賓致詞，話闢一開，如山洪暴發。翻譯人員以其過於八股，不適傳譯，故半小時談話，以五分鐘扼要而譯之。後為谷老所知，大感不滿。某年，日本故首相岸信介應國賓大飯店董事長許金德之邀，來台作私人遊憩，不與人知，抵台當晚為谷老所悉，迅即前往會晤，並共晚餐，餐後復舉行世盟簡報，散會時已近午夜，許董事長預先所準備的一席輕鬆宴會，只好作罷，事後岸首相大感無奈。

管仲有言：「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社會早已亂象橫生，只望多言不當，不再出現，不再為社會增加亂象。

英國前首相奈契爾夫人、蘇俄前總統葉爾欽，他們都是一時風雲人物，自退出政壇後，安然返鄉，過著頤養天年的寧靜生活，媒體難得看到他們的影像，都能自甘寂寞。拿得起，放得下，不作捨我其誰的抱負，此之謂政治家涵養乎？

(原載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時報)

由烹飪業談到政治藝術

——有感創業難守成更難

不久前，台北舉行中華烹飪美展，筆者不禁想起烹飪業的往事。

烹飪不僅是一門學問，也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吃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早已享譽國際，演變至今，大體可以分爲川、粵、上海、平津、福州五大主流。

五十年前，台灣光復之初，台北除了日本料理、西餐之外，最負盛名的就是以台菜爲號召的「蓬萊閣」和由閩廚執掌的「新中華」。這兩所大酒家，規模設備，俱爲同業之冠。每於餐餘，還有琴師、文武場、平劇清唱，終日冠蓋雲集，盛極一時。

當時保安街新中華的福州菜，廚師大部分來自家鄉，所燒拿手的佳餚美食，膾炙人口。不以營業爲主的台銀、台糖、台電等公司福利餐廳，亦都僱用福州大師傅，台北烹飪業，幾已盡屬「閩廚」天下。曾幾何時，閩廚轉而沒落，昔日風光，不可復見，其他各省名廚，反而出奇制勝，日漸壯大，人間滄桑盛衰之變，殆已盡見於此。

閩廚沒落的原因何在？據熟識內情的人說，主要是大師傅們可以共患難，不可同安樂，到了黃金歲月，彼此就爭權奪利，分道揚鑣，各據山頭，相互鬥爭，終至同歸於盡，拱手讓人。有人將「閩」拆字，戲指門

內養了不少的蟲，這群蟲關起門來，自相殘殺，直到門倒屋崩爲止。令人聯想所謂立足台灣，放眼天下，往遠看，走出去，如不團結努力，只恐流爲口號。

百年老店的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執政那段時期，北伐、戡亂、抗戰、流血流汗，犧牲了數千萬軍民，一統中國，功不可沒。日子久了，黨政軍慢慢地各據山頭，自立門戶，黨有派，軍有閥，政有系，缺少憂患相共的團隊精神。大陸的失敗，非敗於共黨，而是敗在關起門內鬥。

追溯三十八年政府遷台，黨的改造，勵精圖治，確有一番作爲，經濟奇蹟，社會富庶，爲世人所樂道。半世紀來，大夢還未醒，內鬥如閩廚，以迄今日，請拭目觀看，這是誰家天下。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千言萬語，玩耍政治，須懂得大政治家風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能有幾人。創業不易，守成更難，大師傅、二師傅，政治藝術，這門課程，你們不可不修。

(原載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

由一個小故事想起

——獻給政壇大人物

民國四十二年，筆者以中華日報社長身分，奉命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高級幹部研究班第一期受訓，班主任為國民黨大老前總統府秘書長張岳公（群）。某夕，院方舉行晚會，學員數人，私自應陽明山管理局長陳保泰之邀，赴招待所宴敘，內有立委吳望伋、丘漢平、退輔會主委趙聚鈺、調查局長沈之岳、海總政治部主任趙龍文及筆者。之岳兄攜來大陳出產高粱，闔座暢飲後，各歸宿舍就寢，只有望伋兄酒力不勝，獨自入盥洗室，擊落臉盆毛巾，狼藉滿地，吵鬧不休，總教官聞聲勸阻始止，並報知岳公。翌日，清晨升旗典禮時，岳公遇見望伋兄，便笑語：「你昨晚太辛苦了」，望伋兄當時滿臉通紅，無地自容，一時傳為笑談。岳公不動用院規，也不說重話，責人藝術，可謂高矣。

「你昨晚太辛苦了」，這句話，言簡意賅，富有智慧，也表現了岳公雍雍大度，調侃才智。

由此我便想起當今政壇上不少人物，常犯「多言」的毛病，每於重要關頭，不能把握焦點，欠缺幽默感，無法舉重若輕，塑造獨特的風格。反而臨場擦槍走火，出語鄙俗，令人啼笑皆非。

多少年來，環顧當代人物，最易犯的通病，就是「官大學問大」，到了

位居要津，就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這是否欺人太甚？

如今，執政換黨，競選期間的劍拔弩張，已經轉變，颱風過後，碧海藍天，水波不興，只是一番景象。群眾殷殷企望於新政府者，厥為少說多做。

民進黨勝選後，新領導人多次向海內外宣佈，今後諸多措施，超越黨派，以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為優先，勤於向各方請益，禮賢下士，用人唯才，未嘗不是好的開始。

筆者淺陋，謹以「為政不在多言，言多必失」一語，代替萬言書，奉獻於新政新人。

(原載八十九年四月八日中國時報)

「震怒」的商榷

嘉義縣八掌溪日前因進行固床工程，四名工人遇山洪暴漲，直升機延誤，救援不及，在激流中苦撐數小時，最後慘遭狂浪吞噬，全國上下，一致悲傷。報載陳水扁總統愛民心切，對於相關單位未能在第一時間趕往援助，及時阻止悲劇發生，極為「震怒」。

此項天災，現已演變成爲一場政治風暴，行政院長唐飛，表示負責，除向國人道歉外，並請辭，經已獲慰留。副院長游錫堃，因兼災害防救委員會主委，表現政務官風度，請辭獲准。內政部長張博雅、國防部長伍世文、警政署長丁原進、消防署長陳宏毅，亦均請辭。此外，尚有十三名軍警有關人員，受到記大過懲處，這是行政院歷年來對單一事件最大的處分。

陳總統對八掌溪事件的「震怒」，使我聯想到兩件事：一爲民國三十三年，抗戰已到最艱困的階段，陪都重慶盛傳貴陽前方士兵嚴重的缺糧，挨餓至死，而後方的糧食部卻發生軍糧大貪瀆案。當時領軍抗日的軍委會蔣中正委員長據報，極為「震怒」，將管糧的高層官員，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軍糧供應，始趨正常。一爲民國三十七年，陳辭公（誠）時任東南行政長官兼台灣省主席，辭公治事嚴謹，當年大陸撤退來台部隊，參差不齊，軍紀不彰，有些軍車，在台北市街頭，經常橫衝直撞，輾斃路人多起。辭公聞訊，也極為「震怒」，對這些軍車司機，只要肇事，下令就在肇事所在，就地正法。交通秩序，始見好轉。

「震怒」這兩個字，聽來真嚇人可怕，有如「九二一」大地震，天翻地搖。

筆者不敏，想提出一個疑問，十餘年來，台灣已是一個法治社會，自由民主，頭家當家，今後如發生任何不幸大小事故，主政當局，爲了親民，爲了政府形象，表現關切民瘼的情懷，似可避免大家長式的「震怒」。古人說，「細語傳重話」，「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其然乎？

(原載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

知識分子的悲哀

日前自立晚報刊載林文義先生一篇短文「知識人的明與暗」，提及李登輝總統於今年五月二十日交卸後，政黨輪替，不少躲在研究室多年的學人，紛紛躍上檯面，為民主賣力，為正義先鋒。作者質疑這些深藏學院，長久埋首禁聲的學人，是否去暗轉明，想欲嚐嚐權力的滋味，果真捨棄讀書人啓迪真理，他認為這是知識分子深沉的悲哀。

談到民主政治，讀書人從政，乃是很平常的事，使我想起幾則有關知識分子的悲哀故事：

其一，若干年前，美國權威雜誌「讀者文摘」，刊載了一則小故事：有某自然科學的教授，一日乘小舟渡江，他問船夫唸過化學沒有？船夫答「沒有」，教授說，你的生命去了三分之一。船到江心，教授再問，你唸過物理沒有？答曰「沒有」。教授說，你的生命去了三分之二，正在船夫驚愕和熱烈交談中，船碰到險灘，兩人一同落水。船夫就問教授，你會游泳嗎？答曰否。船夫說，那你的生命三分之三都完了。

上個世紀初葉，是自然科學掛帥的年代，不少這個領域的學人，多少都帶點頂天立地的虛矯，天地之大，捨我其誰。由這種本位主義思維出發，不顧全局，缺乏遠見，其生命不去三分之三者幾希！

其二，民國六十一年，行政院青輔會為促進海外青年學子團結和為國效勞，開始舉辦國建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年輕學人來台，聽取他們的獻

言。這些學子可以攜眷同行，住五星級飯店，一流招待，多少有點酬庸性質。會議除各方代表外，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高級主管，幾乎都去列席，討論開始，爭先恐後，熱烈發言，有的高論，文不對題，有的不切實際，天馬行空，有的則外國月亮比台灣圓，調門太高，離譜太遠。據部會若干列席友好告知，聽了之後，實在不敢恭維。不過其中當然也有博學之士，建言正確，抓到要害，但為數不多，可謂鳳毛麟角。

國建會開會時，「青年才俊」之盛，氣象萬千，無不另眼相看，後因收效不彰，展轉到八十四年便不再續辦。「青年才俊」之名，不再榮寵，反為戲謔之言，從此沉寂，不復聞矣。

其三，清末民初時，傳說南通狀元張季直（騫）對他的門生洪憲短命皇帝袁世凱感嘆說，項城（世凱）的官位愈高，我的地位愈低，原因是袁世凱在不同時段對老師的稱呼，都有差別。對於這一點，如和五十年來台灣的政壇比劃，那張季直未免食古不化，為官不擺官架者鮮矣。筆者側身新聞界六十年，難得看到兩位大官仍保持傳統的道德觀念。一位是魏伯聰（道明），民國三十六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行政長官陳公洽（儀）下台，中央撤銷行政長官公署，改稱台灣省政府，並指派魏伯聰為主席，公署財政處長嚴靜波（家淦）留任，改稱為財政廳長。民國五十二年，嚴靜波受命組閣，出任行政院長。五十五年提名魏伯聰為外交部長，至六十一年，在職四年餘，魏伯聰部長對嚴靜波院長，謙恭有加。至於台灣省主席和財政廳長的部屬往事，早已忘懷，難得難得。另一位則為國民黨大老故司法院長總統府資政黃少老（少谷），他雖位居要津，對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鄧萃英、老師溫源寧、查良釗，都以

生自稱。

筆者幻想，張季直如遇上魏伯聰、黃少老，就不會長吁短嘆了。

學而優則仕，自古已然，當了官，就難免自我膨大，目空一切，傲氣沖天，這是時下通病。傲氣和傲骨有別，傲骨為一股不為時勢或權貴所屈的正氣，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

知識分子如能保持堅貞、正直、剛毅的精神，憑其最高智慧，和個人節操，有所為，有所不為，不隨風轉舵，那就不會悲哀了。

(原載八十九年八月十日中國時報)

貪得無厭

——解讀葉菊蘭部長說辭

中華電信因釋股和民營化所引發的風波，愈演愈烈，先是員工為爭取權益，提出有關薪資等八大訴求，觸動交通部長葉菊蘭的不悅，因而對員工脫口而出「貪得無厭」。此話一傳，電信工會理事長陳潤洲認為是公然侮辱，不排除到法院控告的可能性，且預定十六日發動「萬人大遊行」，以示抗議。此外，全國聯合總工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勞工總工會，也紛紛表示聲援。

接著悲劇登場，中華電信副總經理李清江墜樓自殺，在公司服務滿四十年的董事長陳堯自感人生無常，不如歸去，因而辭職獲准，由交部常次毛治國接替，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筆者對於這件事，不想多作評論，但希望中華電信順利釋股，員工權益可以兼顧，公司前途發展無量，為減少社會成本損失，風波早日落幕。

不過，對葉菊蘭部長「貪得無厭」這句話，想做點解讀。我認識葉部長多年，民國六十六年，我受和信企業團之邀，參加聯廣公司的團隊，至七十八年止，前後共十二年，總經理為賴東明先生，葉部長於六十二年至七十八年，曾在聯廣服務，擔任業務第一處處長，每逢葉處長主持簡報時，條理分明，工作能力得到全公司上下的肯定，所經手的客戶，也

人人稱許。自七十八年離職，加入民進黨，競選立法委員，每戰必勝，皆以高票當選，其在立法院的表現，也言必有中，不隨意謾罵，受人尊重。

提起「貪得無厭」，使我想起年幼時的故事：

每年除夕夜，先母對兒女必發壓歲錢，我因是長子長孫，紅包都比弟妹大，我還是不滿足，吵吵鬧鬧，先母因而說：不要「貪得無厭」，這句話雖多少帶有責備的滋味，但含有濃厚的母愛，聽了不以爲意。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反而言之，如果出自法官之口，那就不簡單了。

民主時代，公務員是公僕，老百姓是頭家，如果公僕罵起頭家來，那就不可思議了。菊蘭部長，平日爲人嚴謹，作風平淡，「貪得無厭」一語，當非心中之語，其然乎？冒失之處，望菊蘭部長見諒。

(原載八十九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時報)

「國本」漫談

陳水扁總統本月十三日出國前往中美洲及非洲，作「民主外交，友誼之旅」，十四日在多明尼加首都對偵辦尹清楓命案，以堅定語氣對台商及僑胞表示，他不相信辦案到底，會動搖國本，縱使動搖國本，也要辦到底，以展現決心和意願。此語隔洋傳到國內，轉瞬間即獲得不少的喝彩。

在這裏，筆者所要問的什麼是「國本」？學術文化為立國之本，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學無術，無歷史遺產，成為文化沙漠，其國本不動搖者，鮮矣。此其一。專制和民主的大異，一是人治，一是法治，法治為民主國家治國之本。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而平天下。法不在多，要能徹底執行。貫徹公權力，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因人而異，如此國本就不會動搖。此其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古有明訓，教育為建國之本，教育機構所培育的青少年，如近年來電視和報紙所常見的子弑父、母毒女，飆車殺人，吸毒害己，為了錢，拐騙、詐欺、勒索，無所不為，或為了情愛細小事故，懷恨殺人，分屍荒野，慘不忍睹，後代子孫，如果朝此發展，其為害超過九二一大地震。國本的根基崩潰，不動搖也很難。此其三。經濟突飛猛進，資訊科技掛帥，外匯存底將近八百億美元，此為活命及國家發展之本，所可惜者，此項成就，不能和社會倫理、精神道理，成為正比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有鑒於此，數年前，提倡心靈改革運動，可惜效果不彰，不但不彰，反而江

河日下，成爲畸形變態的怪現象，國本當然也受到波及。此其四。

以上所說，足見鞏固國本，並非易事，執政者如稍有意忽，不能把握機先，一旦風雨來襲，整座山岩，必將隨流而下，猛瀉千里，不可收拾。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原載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

胡適與李遠哲

聯合報日前獨家訪問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以整版篇幅報導李院長由美回台後六年來的心路歷程，李院長最希望看到兩件事，一是政黨輪替，一是消滅黑金。

關於政黨輪替，他認為民進黨陳水扁總統應當執政，至於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身邊都有黑金人士的陰影，使一般頭家難以安心。

談到黑金，李院長指出「九二一」大地震後，南韓一元納稅錢就做一元的事，而我們是一元捐款，做五毛的事，黑金如不解決，台灣必定沉淪下去。

此外，對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李院長說他的心態就像國中後段班的學生，感受被遺棄，因此常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李前總統對民主政治，雖有貢獻，李院長認為他拋棄理想而和地方黑金勢力結合，支持他的人，慢慢都出了問題。

以上這些論調一出爐，馬上引起軒然大波，國民黨連主席辦公室發言人丁遠超，立刻予以駁斥，痛批李院長抹煞李前總統對他的敬重與禮遇，指為「忘恩負義，言辭刻薄，醜化李前總統，以偏概全，與事實不符，講話不負責」。親民黨發言人孫大千也認為李院長於大選前早有既定支持人選，卻在選前以公正客觀的學者形象，影響選民投票，選後又漠視

執政失當，卻以妥協合作為藉口，這分明是「用理想要求對手，以現實原諒自己」。

這場鬧劇，李院長迄今未作回應，筆者好管閒事，由李院長目前的處境，突然想起故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之先生（適）。

適之先生出身哥倫比亞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抗戰期間，出任駐美大使，勝利後，接任北大校長，民國三十八年赴美講學，四十七年返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至五十一年去世為止。適之先生一生推崇西方自由思想，抨擊不合理的傳統，為新文化運動播種者、近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學人。

李遠哲院長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博士，曾任該校講座教授、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勞倫斯實驗室材料化學所負責人，並獲得諾貝爾獎，自八十三年接受李前總統登輝先生邀請來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來，備受各方重視，平日除兼教改工作外，並熱心公益，如賑災等等是。對於政治，李院長自己承認不是政治家的材料，也明知政治的「排他性」特別強。基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他不怕各方責難，還是站出來。

適之先生所學的是人文哲理，李院長所攻的是自然科學，適之先生雖沒有拿到享譽國際的諾貝爾獎，但他對近代新思潮與文學革命促成「五四運動」的貢獻，就非一般人所能及。

抗戰期間，先總統蔣公，為了平息各方的雜音，曾一度有意安排眾望所歸的清流學人適之先生出任總統，但未為適之先生點頭。四十七年適之先生由美返台，受聘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當年執政黨也曾一度請他組

閣，出任行政院院長，但沒有結果。反之，自由中國雜誌案發生後，創辦人雷敬寰（震）下獄，齊世英、吳三連、成舍我、程滄波、陶百川、李玉階、高玉樹等，這些支持籌組反對黨的社會賢達，都成為問題人物。適之先生雖公開表示贊助，但未聞當年的執政黨曾有「忘恩負義」的譴責，照樣在南港中研院安然從事學術工作，以迄去世為止。

李院長於大選期間，國民黨、親民黨、民進黨，三個陣營都找過他搭檔，陳水扁總統且希望他參選總統，自居副座，李登輝前總統任職時，曾於桃園鴻禧山莊面邀李院長出任行政院長，但沒有下文，李院長所受到的重視，決不比適之先生差。

李院長表示中研院二十年來進步可觀，有些研究所目前都做得很深入，希望能繼續提升，達到世界先進國家的水準，這是李院長的企圖，也是他的責任。李院長辭官不就，且口口聲聲，非政治家材料，為何不專心於學術研究工作？反而因熱心社會公益，而願在政治舞台客串，唱上幾句。這種角色，唱得精彩，那是藝術，如果荒腔走板，台下觀眾，必然反彈。

讀書人，首重氣節，如果被說為「忘恩負義」的人，你有何感想？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如中研院院長，也遭受「忘恩負義」的批評，你又作何感想？

適之先生和李院長的出身、教育和學術成就以及所處的時代、環境、遭受，有許多相似，也有不少的不同。其最大差異，就在兩人同在政壇客串，一個遭受到「忘恩負義」指責，一個安然無事。筆者側身新聞界半世紀以上，以一個老兵觀察，玩政治，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無論主角

或客串，就在乎能否拿捏分寸，發揮最高智慧。

(原載八十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國時報)

總統與媒體摯友

論交友，不是一件容易事。歐陽修說：「君子與君子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同利爲朋。」尤其是總統和媒體記者結交，彼此常見面，各有所求。記者所盼望者，是由總統口中得到獨家的頭條新聞，總統的期待是由記者筆下能充分發揮所知所曉宣揚國家的政令。總統和記者的需求，雖各有差異，但都是站在自身光明正大的立場，爭取籌碼，是君子同道之交，非小人唯利可比。孔子對交友所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就是這個道理。

爲闡明孔夫子交友這兩句話的真諦，筆者想談談中外兩位總統和記者同聲同氣，相應相求的往事，作爲執政當道和記者交往的參考。

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軍夜襲瀋陽，即所謂「九一八事變」，進而佔領整個東北開始，以迄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發動蘆溝橋七七抗戰爲止，在這六年艱苦的歲月中，先總統蔣公，擔負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內憂外患，全國上下都以政府不抗日責難，上海學生在京滬鐵路臥軌抗爭，北方平津各地抗日學潮，此起彼落，演變到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蔣公被劫持，要求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容納各黨各派，改組南京政府，達到了高潮。

抗戰發生前，政府所受內外的壓力，極爲沉重。蔣公並非不抗日，只以時機未成熟，備戰有待時日，不爲各方諒解。幸賴當年以大公無私，客

觀公正爲號召，獨立經營的民營上海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幫了大忙，蔣公經常約季鸞先生由滬去京兩人餐敘，評論國家大政。蔣公對季鸞先生，敬佩有加，百般信賴。因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季鸞先生也深知政府處境之難，及未來國家走向。大公報並不以所知最高機密洩露萬一，反而爲政府立場說清楚、講明白，社論常常小罵大捧，爭取輿論支持，化解疑慮，取得各方同情。當年上海的新聞報和申報，實力雄厚，發行量雖超過大公報，但影響力遠不如大公報。季鸞先生能得到蔣公的讚賞，視爲摯友，這是聲氣相投的結果。季鸞先生去世後，蔣公於出巡時，曾至陝西張家墓園憑弔，感念之情，可想而知。

民國三十二年，中日戰爭已到了第六年，政府由南京西撤，遷至四川省的山城重慶，一切外援靠由印度飛越希瑪拉雅山運到大後方，困難可知。政府爲強化軍運必須打通雲南昆明到英屬緬甸的公路，稱爲滇緬路，以利抗戰。因此，組織了一個訪英團，由與英國有良好關係的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王世杰、中英文化協會理事長杭立武、出版界巨擘商務印書館負責人王雲五、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因社務羈身，未隨行），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等擔任團員，他們到了英倫，見到邱吉爾首相，完成任務後，即轉往華府，晉見另一盟邦領袖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總統於白宮會見該團時，曾問團員胡政之：「你知道現有一位駐華府的記者任玲遜（RICHARD JEN）嗎？他一個人的工作成果，超過貴國三位大使。」玲遜兄當年是中央社駐華盛頓特派員，因獲得羅斯福總統信任，經常出入白宮，也陪過羅斯福總統吃過不少次的早餐，彼此不拘形式，暢談中美雙方種種軍政大事。因此，他發到重慶中央社總社的電訊，富有高度的新聞價值。但極爲機密，社方不發通稿，而以中央社「參考消息」處

理，只發給黨政軍極少數的幾位大員。這些參考消息，多屬重要情報，由駐美大使館報告到陪都外交部時，比中央社的參考消息，往往慢了一個星期。

一個國家的領袖，日理萬機，一切重大政策，如國防、外交、財經等以及兩岸關係，由幾位發言人或例行記者招待會來宣佈或解答，人多口雜，易流於形式，難免有不周之處，或對問題分析不夠深入，失去傳播的可信度。執政最高當局如總統者，如能放下身段，交上幾位有為有守的媒體摯友，經常到官邸喝咖啡，自由自在，談天說地，既親切，又輕鬆，天下事往往在無意中間接而迅速地可達到預期的目標。

(原載八十九年九月五日中國時報)

板蕩識忠貞

自從民進黨執政以來，這四個月裏，可說是舉步維艱，荊棘重重，其中原因，犖犖大者，不外如次：

民進黨能執掌一家百年老店，成功得來艱辛。這家老店的建造，時間久了，棟樑難免暗生蛀蟲，屋內藏了不少白螞蟻。接手過來，千頭萬緒，要加以改建和裝修，工程浩大。再加上新手團隊，行政經驗，不夠熟練，求勝心切，只望儘速擇吉開張，鴻圖大展。因為時間太短促，適應性又不足，結果恰得其反，這是意料中的事。此其一。

政黨輪替，在英美等先進民主國家，這已是家常便飯，而在台灣卻是空前的大事。因為憲政體制運作上的缺失，目前既非總統制，也非內閣制，更不是雙首長制，有人稱為憲政怪獸。陳水扁總統雖由全民選出，但施政無法用上大力。這種體制上所衍生的亂象，現在已到了高峰。在民主浪潮衝擊下，言論自由，百鳥齊鳴，百花齊放，百病也齊發。最明顯的例子是一直對台灣經濟基本面最有信心的外國投資機構，在新政府上台四個月以來，開始大賣股票，就在九月份已賣超了兩百億元，外資沒有信心，國內股價跟著狂瀉，投資大眾，走投無路，經濟枯萎，影響了整個社會，治安惡化。此其二。

這種亂象，一般人看了，心驚膽戰。筆者認為這是我國目前政治發展上的常態，如果不發生這種亂象，反而是失常，不必過分惶恐驚慌，只要

建設「心防」，培養信心，仍然可以渡過難關。民國六十八年，中美斷交時，國本動搖，衝擊力之大，和今日的亂象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政府當年高喊「處變不驚，莊敬自強」，民心暫轉平定，安然度過艱苦的歲月。

要徹底消除目前的亂象，只有修憲。修憲的工程，太不簡單，曠時廢日，那年那日可以修成，誰也沒有把握，遠水難救近火，老百姓現在所希望的是平安過日，風調雨順。如果想達到這種境界，只有靠朝野各方發揮最高的智慧，以國家利益、民眾福祉為優先，坦誠協商，共同解決眼前的迫切問題。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前日在立法院聯誼會對立委說：「各黨團為維護各自的立場，彼此唇槍舌戰，甚至有暴力衝突，都是因為大家只站在自己的立場想事情，認為只有自己是對的，只有自己是為民眾謀福利的，大家一定要尊重對方的想法，不要只從自己的想法思考，要為對方設想，如此就不會將別人當成敵人看待。」這真是晨鐘暮鼓，暗示多難興邦的大道理，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國民黨主席連戰，日前在台北市行德宮十周年慶典致詞時說：「看到目前亂象，國民黨不會在一旁嘻嘻哈哈，或抱著看笑話的心態，大家都是同舟一命，都在同一條船上，若船沉下去了，換了誰執政，都沒有用。」大哉斯言，不但寓有危機意識，而且顧及全局。這幾句話，此時此地，出自一位在野黨的領袖，真如陰霾中看見了一線曙光。寶島只有一個政治舞台，舞台如倒塌，這些大明星就無處可供表演了。

雲端看廝殺，畢竟誰輸贏，聽了聖嚴法師和連戰主席為國為民的談論，似有「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貞」的味道。

(原載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

對新政府的期盼

民進黨執政四個多月以來，因為憲政體制運作上的困境，步履維艱，造成民心不安，經濟衰退，股市一落千丈的亂象，國本動搖。到了本月三日夜，行政院長唐飛獲准辭職，全台老百姓，當天晚上都守在電視機旁，關切這場政治風暴的影響，直到深夜，人人都有山雨欲來的感受。翌日清晨，陳水扁總統步出官邸門口時，面對記者問及當前的心情時，陳總統表示「很好，很好，睡得很好」。一向關心民瘼，勤於基層走透透的陳總統，在那晚各地亂紛紛的夜裏，獨能安睡嗎？果真如此，那似是諸葛亮演空城計時，在城樓上唱給司馬懿聽的台詞，安定民心，穩固軍心而已。

內閣改組後，張俊雄出線，接長行政院，陳總統說：「過去四個多月來，新政府團隊有一些問題，但已將石頭拿開，車輛也將整修，重新繼續上路，未來台灣經濟發展會更好。」拿開石頭說見報後，朝野各有解讀，引起一場大風波，總統府官員忙著澄清「石頭」是指舊體制、舊包袱，非針對特定人士。

筆者認為這條大道往前走，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平坦，一塊石頭搬走了，可能還有不少的大小石頭橫在前邊，路況不明，還會碰上土石流。

眼前急著要搬走的另一塊大石頭，是「虛驕」。四個多月來，執政黨若干人士，犯了「虛驕」症，這些帶有虛驕細菌的人物，得意忘形，不知

人群間交往的必要性，距離日遠，誤解愈深。阻塞血脈流通，嚴重的話，且將導致全身癱瘓。親民黨主席日前對當前動盪政局曾表示，如果執政黨不能放下「權力的傲慢」，不肯承認在國會是少數黨，政治亂象將會繼續。權力的傲慢，必然產生虛驕的作風。

解決目前的危機，只有儘速建立協商機制，以謙和誠信的態度，溝通再溝通，新任行政院長張俊雄希望以「合作代替對抗」，放棄對抗和對立舊思維，發展互相合作的新政治。立法院長王金平強調國民黨不會刻意刁難，願意共體時艱，協助新政府渡過難關，這是我們老百姓所最願意聽到的聲音。

新任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及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秉性淡泊，沒有「虛驕」氣，皆一時之選，也是談判高手，望把握時機，帶上望遠鏡，穿起大格局衣衫，帶領先頭部隊，向前邁進，成功的日子，近在眼前，但也遠在天邊，一切就看你的智慧了。

(原載八十九年十月十二日中央日報)

陳總統的「絕不」

十月五日，陳水扁總統於自來水公司七區管理處聽取水公司董事長林學正澄清湖高級淨水廠處理模型場簡報後表示，大高雄用水問題是民眾永遠的痛，無法與台北市相比，他允諾三年內投下一百五十億元以替代方案，改善大高雄水質，同時明確表示，任內「絕不」興建美濃水庫。此其一。

十月十四日，行政院鑒於股市重挫，財經情勢低迷，爲了改善投資環境，振興景氣，財經小組擴大會議特移師總統府舉行。總統副總統都親自出席，財經首長、四大工商團體領導人都都全程與會。會後做成免除金融營業稅，推出四千五百億專案貸款傳統產業等八大政策措施。陳總統致詞時，提出提供資金、人才、水電、用地等保證，但強調「絕不」加稅。此其二。

從以上這兩個「絕不」，表示陳總統關切地方建設及民眾福祉，有擔當，有魄力，說話斬釘截鐵。但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十六日在立法院卻說：「陳總統說話稍多，讓人捉摸不定，治國方向不明，不知要把人民帶往那裏去。」兩者相較，似南轅北轍，相去甚遠。

筆者在這篇短文中所要談的是「絕不」這兩個字，簡單說來，「絕不」好似閉了關，自我約束，也好似立了終身契約，喪失自我的選擇。天下事，變化莫測，許多客觀的變動，任何人往往無法如願控制。民國三十

四年十月五日台灣首任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和我同日由陪都重慶飛到台北，有人問到他的籍貫時，他口口聲聲說是福建人，「絕不」承認台南人，情勢演變的結果，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黃議長變調了，我是台南人。故總統蔣經國先生於宣布解嚴、開放黨禁等重大政策後，也到處向人說：「我也是台灣人。」為政之道，要懂得窮則變、變則通的要訣。

「絕不」說多了，很容易使總統扮演成爲權威角色，破碎了民主的美夢。這點道理，陳總統應充分瞭解。

政壇大老張岳公（群）生前常引用彌勒佛前的對聯：「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慈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彌勒佛雖始終不發一言，但亂世治國，當知此中妙處。

（原載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中國時報）

溝通、虛懷、諍友

——主政者應有的認知

目前台灣政局動盪，社會不安，眾論紛紜，朝野憂慮。這些亂象，如何獲得撥雲見日，掃除陰霾，為國家回復安定，令人想起以史鑒今的往例。

先談溝通，民主政治，政府與人民之間，不能缺乏溝通。台灣光復之初，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長官陳公洽（儀）蒞台，步下飛機，便對在場的記者說：「我到台灣是來做事的，不是做官的。」聞者耳目一新。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他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公而忘私的投入公務，生活簡樸，連中午都不回家，在辦公室以便當果腹。但他很少與外界接觸，將自己關在長官公署，築了鴻溝，所見所聞，僅限於若干部屬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的言語。自然談不上深諳民瘼。他雖很愛台灣，很想為光復後的台灣重建，但以秉性剛愎，不易接納別人的意見，遠離民眾，缺乏溝通，不瞭解民眾真正的需要是什麼，政府與民眾構成了不為他所知的隔閡。美國合眾社記者因而謔稱他為台灣土黃帝。未到兩年，即因與民眾各種隔閡，未能設法疏導，應驗古人所說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終因釀成了二二八事件，迫使下台。民國三十六年冬，我往南京中央通訊社總社述職時（時任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道經上海，曾到中山醫院探望他，他對我說，不能認識台灣，上下缺乏溝

通，這是他從政以來最大的失敗。

再談虛懷，虛懷的反面，就是虛驕。唐代魏徵對唐太宗說：「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高危、滿盈，都是領袖人物不可缺少的修養，惟有謙沖，始能接納各方的意見，不至執意孤行，成爲獨夫。而懼滿盈，尤須保持江海之量，始能聽取雜音，容納異己，不汲汲於反對者的言論。歷史上，多少成功的領袖，如劉邦、朱元璋等人，都有這種器度。他們能尊重那些賢臣的意見，或運籌帷幄，或集思廣益。所謂舊政府時代，側聞領導階層每遇國家大事，主政者常邀高層人士，成立小組，謀取對策，形式上雖在聽取意見，而實際則早已拿定主意，與會者恭聽主持人高論之後，只有附和，聽不到反面的真言，何來虛懷？曾國藩所說的「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事致於顛覆」，誠爲知言。如今主政者如缺乏虛懷，似需有待檢討。

還有諍友，也是領袖人物所不可缺少，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時，追隨先總統蔣公與蔣公年齡相差無幾的元老，最爲蔣公所重視的是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岳軍（群）、吳禮卿（忠信）二老。他們歷經憂患，爲國勤勞，大陸雖已撤退，而忠黨愛國的款款真誠，從未稍減。每遇疑難或逆境，他們總是披心瀝膽的坦然爲蔣公直陳各種意見。尤其是吳老，雖曾任新疆及貴州省長、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但來台後，無意宦途，屢辭不就，仍能持其老成謀國的忠心，爲政府獻言。岳公具有恢弘寬厚的胸襟，處事維周，爲政府化解不少疑難，蔣公所以視二老爲諍友，其來有自。經國先生主政時代，前司法院院長黃少老（少谷）亦爲其諍友，二人相契甚早，交誼至厚。當民國五十二年少老自西班牙大使

卸任返國時，經國先生曾訪少老於天母寓所，屬意繼蔣廷黻為駐美大使，當即為少老所婉拒。並答以：「希望以後不要做官，成為你的朋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將來你為國家負起大任時，需要像我這樣的朋友。」後來經國先生逝世，少老輓聯有「憂患久相隨，論事陳情，許我言無不盡」之句，相知之深，於此可知。政治人物殆不可無諍友。

新政府上任將及半載，求治心切，但以新手接事，難免跌跌撞撞。政治是一種藝術，如能朝向溝通、虛懷、諍友等，予以重視，或有補益。

筆者不揣愚昧，憑一時觀感記憶所及，坦率直言，願為新政府略申獻曝之忱。

(原載八十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國時報)

誤事與害事

——亂局感言

歷史上，古今中外，上至國家，下至個人，都有很多成敗得失的記錄，關鍵就在於一念之間的抉擇。明智的成功者可以掌握危機，扭轉乾坤，進而創造時勢，由累卵之危，化爲磐石之安。失敗者則往往昧於情勢，未能掌握機先，踟躕不前，猶豫不決，以致延宕自誤，造成無可挽救的頹勢。台灣目前的亂象，眾論紛紜，受人爭議的問題不少。這些事端，是否與誤事或害事有關，未免令人疑義。我們從過去政治人物的成敗得失去找尋答案，或可作為明鏡：

——**掌握時機** 時機來去，稍縱即逝，成敗每多取決於能否掌握。尤以政治舞台，錯綜複雜，不容忽視。民國三十三年，抗戰已至末期，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及淞滬警備總司令的熊天一（式輝）將軍，以軍事訪問團團長名義，奉命赴美晉謁盟國總統羅斯福，約定當日在白宮晤面時，遲到十餘分鐘，遭到左右以另有貴賓來訪婉拒，並告以請另訂時間。此行商談關係大後方軍援及整個作戰計畫，無疑已被誤事。在陪都等候及時回音的軍委會蔣委員長，難怪又一次「震怒」。此事發生後，重慶街頭巷尾，一時傳為笑談。

——**施展魄力** 魄力關係施政成敗，民國三十七年底，陳辭公（誠）出任台灣省主席，揭舉「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施政最高原則。寶島當

年處境艱危，外則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惶惶，內則戰後瘡痍滿目，百廢待舉。辭公憑其鐵腕，展現魄力，首先著手三七五減租，改善農村生活，隨而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順利完成土地改革，並將台泥、工礦、農林、紙業四大公司開放民營，為建設台灣開拓新的境界。當時不乏反對雜音及重大阻力，但以辭公堅毅果斷的決心，終於完成劃時代的任務，導致後來經濟起飛的奇蹟。辭公去世時，朝野哀悼，沿街設奠，為台灣罕見現象。

害事不可怕，可及時察覺，設法挽救。誤事如隱藏體內的癌細胞，無法即時發現，到了病入膏肓，悔之晚矣。已故監察院院長于右老（右任），曾有名言：「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須求萬世名」，正如司馬遷所說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願從政人員都有此見識與胸襟，掌握時機，對國家重大政策，施展魄力，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拯救生民於水火中，幸甚幸甚。

（原載八十九年十二月三日中國時報）

「劃地而治」的厄運

——懷念葉公超大使

歲暮風雨，對景懷人，不禁想起才氣縱橫的葉公超大使。

公超先生去世已將近二十載，冥壽也將近百齡。他的一生，當以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以後，國家處境艱危，主持外交部九年六個月，任內簽訂中美協防條約及中日和約，顯其折衝壇坫之才。民國四十九年卸去駐美大使回國後，抑鬱寡歡，澹泊自適，故舊相逢，對國家大事，每多不為流俗所認同的警世牢騷，但所秉持的見解，往往為人所未察。公超先生懷抱不世之才，都與歷史上傲骨崢嶸的人物相似，未能為國所善用，至今令人扼腕。

公超先生自美以大使身分回國述職後，即未返任，滯留寶島，並在台北市松江路設籍，與筆者比鄰而居。十幾年的歲月，無分晝夜，常來舍間，或便飯，或閒談，來去自如。我們坦誠相見，無話不談。某次，他談到當年退出聯合國的處境，此事追溯到民國六十年之間，楊西崑以我國駐聯合國代表身分回國述職，向總統蔣公報告中共加入聯合國情勢及我國是否退出與利害得失，並陳述若干友邦如美日等大國，都希望我們仍留在聯合國。據悉，蔣公聽畢，一語不發，只說「你們缺乏革命精神」。後來所謂「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不知是否即由此形成。公超先生與我談到這段往事時，他以無限感慨的語辭，論斷歷史的發展，

說出「劃地而治」的害處。劃地爲牢，天地太小，厄運來矣。公超先生認爲退出聯合國，雖爲形勢所逼，但亦出於意識作祟。退出以後，迄今數十載，不得其門而入，只得堅守彈丸之地，外交空間自然受到嚴重影響。

劃地而治，欲以自保，容易孤立無援，苟延殘喘，甚至閉門自相殘殺，其爲害有如台灣公車上所見的標語：「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距離確已保持，安全能見之乎？

公超先生所謂「劃地而治」的論調，轉眼已過了二十多年。如今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但意識形態，仍然擾攘不休，目之所視，耳之所聞，幾乎到處有此現象。台灣今日的政治環境，執政者如能爲國爲民爲子孫後代，摒棄一黨之私，以大格局、大眼光、大胸懷，消弭意識形態的陰霾，跳出小天地，不劃地自賞，爲人民福祉而努力而賣力，無論從那一角度來看，前途是一片燦爛風光。

(原載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時報)

政務官的擔當

——由媒體記者搶新聞談起

半世紀來，筆者側身新聞界，因工作關係，所見所聞多矣。環顧台灣，多年來政壇上若干政務官，遇到重大案件發生的時候，往往不是向下推，就是向左右卸責，甚至往上拖，說是層峰授意，將自己洗得一乾二淨，半點責任也扯不上。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戀棧不去，貽害社稷。

由政務官的作風，筆者偶然想起葉楚傖部長的一段往事。

國民黨北伐完成後，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的葉楚傖先生，一生喜愛文教及新聞事業，曾在上海主編「生活日報」與「國民報」，爲當時著名刊物。楚傖先生因熱心革命工作，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先後出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秘書長及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立法院副院長等職。抗戰勝利後，奉派爲江蘇宣撫使。

「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後，日軍得寸進尺，由東北而華北，蠶食疆土，殺戮無辜。全國民眾，熱血沸騰，反日風潮，此起彼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京滬學生，臥軌抗議，平津學潮，到達高峰，舉國要求政府早日抗日。

民國二十六年，國府軍委會蔣委員長中正，鑒於民情不可遏，乃在江西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秘商抗日大計。軍事行動，需要準備，不可能說到就做到。環顧當時日方的氣勢，壓力很大，這件事只能暗中進行，不便公

開。於是，全國民眾都以政府「不抗日」相責，真是進退兩難。

就在軍事會議後，奉派採訪的中央社記者馮志翔（抗戰時曾任中央社成都分社主任，來台後出任香港時報特派員及中國時報副社長等職），迅速把握時機，將軍事會議決定抗日的訊息，向南京中央社總社搶先報導。

隔日這則震動海內外的重大新聞，全國報刊都以第一版第一條最顯著的地位刊出，政府即將宣佈抗日。各地一片鼓舞聲、擁戴聲，民情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就在當天，南京的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趕往外交部晉見部長張岳公（群），表示嚴重關切和抗議。廬山的蔣委員長聽了報告後，大大的震怒，下令徹查嚴懲洩漏消息的人員。

蔣委員長的「震怒」，驚動了南京中央社總社的上下，記者馮志翔兄首先向總編輯陳博生先生自請處分。博生先生以志翔兄適時報導事實，沒有理由處分他，論責任也許是編輯部的疏失。於是博生先生向社長蕭同茲先生簽請處分。這件事，蕭社長認為採訪和編輯部都沒有錯。如有過失，或許是社長平日督導無方。於是他向中宣部部長葉楚傖先生當面自請處分（中央社當年不是財團法人，直屬國民黨中宣部），楚傖先生聽了蕭社長報告後，旋即向蔣委員長面報，中央社如何善後，果要處分，楚傖先生自認平常缺少指示，願全部承擔責任，中央社由社長以下，無庸懲處。最後楚傖先生又向委員長表示，這則新聞揭露後，有了正面作用，四方八面，都可聽到擁戴政府的聲浪，錯中有對。委員長聽了之後，不再堅持洩秘的處分。一場風波，就此煙消雲散，隔不久，蘆溝橋七七抗戰爆發，全國上下高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政府以空間換

取時間，打了八年的硬戰，死傷數千萬同胞，勝利後，光復了台灣。

政務官者，如楚儵先生這種有擔當的人才，真是人傑。「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政黨輪替後，新人輩出，但願處事作風，向楚儵先生看齊。

(原載九十年一月九日中國時報)

感懷兩則

——「能忍」與「守秘」

歲末春初，閒居無事，回想來台五十餘載，由陳公洽（儀）主政開始，演變至今，真如一部電影紀錄片，有血有淚，也有笑聲。到了去年五月，政黨輪替，可說到達高潮。執政黨上台以後，新手忙於摸索，加上體制上障礙，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以至政局動盪，民不聊生。廟堂上不能說沒有濟世之才，但虛矯者也不少，這些人士的作風，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在這裏，筆者想起了半世紀來政壇上兩位湖南大老：一位是蔣廷黻大使（一八九五——一九六五），一位是黃少谷院長（一九〇一——一九九七），這兩位大老的學養，立身處世，爲國爲民，很多值得懷念，供後人效法。

蔣廷黻的「能忍」

蔣廷黻大使出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曾任南開及清華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爲近代史權威。以學者從政，曾先後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駐俄及駐美大使，民國三十六年出掌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在職期間，對我國代表權之維護及控蘇案之獲得

通過，貢獻甚大。

四十六年，筆者應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之邀，前往美邦訪問，是年秋，道經紐約時，曾訪謁聯合國代表團蔣廷黻代表。蔣代表當即告訴我，翌日聯合國將召開大會，問我有無興趣去旁聽。我認爲這是一個難得機會，隨即答可。蔣代表馬上吩咐副代表薛毓麒大使，爲我安排。隔日並陪我同往聯合國大會，我坐在代表團後面旁聽席上，當蘇聯代表發言誣衊中華民國力挺中共言論時，滔滔不絕，在場與我國有邦交的代表團都紛紛離席，只有蔣代表仍安坐不動，在面前不斷寫一個「忍」字，一而再，再而三，寫了幾十個「忍」字。事後我問蔣代表爲何不離席，蔣代表的回答，無聊的話，千篇一律，只好忍耐，姑且聽之。至於不離開席次的原因，爲防止蘇聯代表團可能提出不利於我的臨時動議，只好據席不走，準備應戰。

蔣代表學識淵博，對蘇聯侵華研究頗深，每次在聯合國發言，說的雖是滿嘴湖南邵陽口音的英語，但所舉史實及辯才，都能獲得在場人士的讚賞。

「能忍」，就能「容」，能容，就能大。古人說：「有容乃大」，小不忍則亂大謀，大謀者，國之大事也。政治人物，如斤斤計較芝麻小事，以牙還牙，實爲不智，也非國家之福。

黃少老的「守秘」

黃少老（少谷）於民國十二年以半工半讀方式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開始

與新聞界接觸，進入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老（舍我）在北京所辦的世界日、晚報工作。二十三年赴英，入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二十六年，抗戰軍興，返國從政，並出任掃蕩報（後改名和平日報）社長。

少老和蔣廷黻大使最大不同點是蔣大使以學人從政，少老以報人報國。少老一生，嚴於克己，勇於任事，曾先後出任監委立委、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兩度任行政院秘書長及兩度任行政院副院長，先後在行政院任職九年四個月，中間並繼葉公超博士為外交部長及出任西班牙大使。五十六年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資政，六十八年，出任司法院長，在職七年十個月，黨政經歷，可謂豐矣。

數十年來，少老知道黨國的秘辛最多，但出於他的口卻最少，平日謙沖自牧，守口如瓶，以之立身處世，故能受知於先後兩位蔣總統，共襄國是。

二十八年少老隨先總統蔣公由大陸撤退來台，出任總裁辦公室秘書室主任，在草山（陽明山）設館辦公。從那個時候開始，與筆者交往，日漸頻繁，受益非淺。半世紀來，國家大事，除主動告知外，筆者從不以秘辛一類之事相詢，以免彼此尷尬。

在這裏，舉個少老守秘的故事，日前監察院通過孫立人的調查報告案，為孫立人將軍近半世紀不白之冤平反，這是政壇上一件大事。實際真相是四十五年郭廷亮等人共諜案，牽涉到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將軍。此案發生後，震撼海內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如處理不當，可能導致殺身之禍，就因案情重大，先總統蔣公指派陳誠、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組成調查委員會，以陳誠為

主委。此一委員會，包括一位副總統、前後任三位院長、兩位資政、兩位副院長與一位部長，重要可知。少老負責草擬報告，事前疏通各委員，以此案涉及政局及國際觀感，力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並以孫立人將軍，久歷戎行，抗戰有功，特准辭去現職（參軍長）結案，法紀之外，寓有寬宥之意。少老用心之苦，四十餘年來，從不對人言。對孫將軍長期被拘，雖身在廟堂，自愧一無作為，深為同情。

環顧台灣今日的社會，若干人利用知秘，作為政治資本，或則不顧他人隱私，運用媒體，大肆渲染，毀壞對方形象。少老地下有知，必然長嘆。

尾聲

新政府如想達到政通人和，從政人員的品質，急待提升。「能忍」和「守秘」是起碼條件，新春試筆，奉獻執政諸公，除精選人才外，為國為民，放眼天下，應掌握治國大方向，施展魄力，不朝令夕改，以新作風，創造新境界，把握機先，不猶豫，不故步自封。「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此之謂乎。

（原載九十年一月三十日中國時報）

徐州失散，古城相會

——毛蕭對飲的啓示

煮酒論政，這是多少英雄豪傑的常情。台灣自成爲「民主之窗」以後，大小選戰，幾乎年年有，競選者爲了爭取勝利，往往忽視政見，不惜花費鉅資，大規模宴客，少則幾十桌，多則幾百，甚至千餘桌。主人到處敬酒，每桌乾杯，爲的什麼？無非勝選。台灣的飲酒乾杯，揚名海外，據說若干單位於外賓來訪時，爲了表示主人的誠意，每於招待席上，一乾再乾，乾到幾乎人仰馬翻，寶島因而被譏爲「乾杯文化」之鄉。

談到乾杯，筆者想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者毛澤東和中央社創辦人首任社長蕭同茲的一段往事。

中共主席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當黨內權力傾軋的期間，毛氏鬥倒一切被猜忌的人，演變到「文革」，達到了高潮，毛澤東之名，無人不知。

蕭同茲（一八九五——一九七三），湖南常寧人。一生從事新聞工作，民國二十一年，接長中央社，三十三年，當選國民黨中常委。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後，可說是中央社鼎盛時代，全國各省都設分社，世界各主要都市也都有分支機構，海內外員工四千餘人，可與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同盟社並駕齊驅。三十九年受聘爲中央

社管理委員會主委，五十三年退休，受聘為國策顧問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蕭社長一生瀟灑倜儻，富有強烈的愛國情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名聲雖比不上毛，七十餘年來，他在新聞界的地位，人人尊敬。

論年齡毛比蕭長兩歲，當年都是湖南青年才俊。中學時代，毛與蕭及幾位同學，受了新潮流影響，都有革命意識，志趣相投，彼此交往頗多。蕭的家庭，比毛富裕，一九一八年，當毛由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時，由師長介紹，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當時曾向蕭借貸盤費二十銀圓，毛到了北京後，受館長李大釗影響，思想逐漸左傾，走上共產主義路線。而蕭一路走來，都是服膺三民主義。從那個時候起，彼此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後，面對接管日本佔領區及重建問題，國共衝突四起，中央蔣主席為便於解決歧見，是年八月，特邀請毛由延安中共大本營到重慶共商國是，由美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希望避免內戰，建設新中國。美總統杜魯門後來並派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解。

當毛於八月二十八日飛抵重慶後，隔兩日故立法院長中蘇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孫哲生（科）即舉辦迎毛大型酒會，介紹政府官員、各國使節、各黨各派人士見面。毛於會場上盡力壓低姿態，表現理性溫和，並由周恩來（後出任國務總理及外交部長多年）陪同向數百位貴賓逐一敬酒，那自然只是蜻蜓點水意思意思而已。當行經蕭社長面前，毛即向蕭說：「蕭先生，多年不見了，敬你一杯。」然後說：「徐州失散，古城相會。」（按三國時代，群雄割據，陶謙刺史三讓徐州與劉備，因遭曹操

所逼，你爭我奪，劉備居無寧日，後來投靠袁紹，桃園三結義的劉備關羽張飛，從此分散，關歸曹營，張流亡於古城。幾年後，三人終於古城相會。) 站在旁邊的周恩來，馬上向蕭說：「毛先生喝多了，這杯酒可否由我代飲。」毛搶著說：「不可，不可。」隨即飲乾順延而去。這杯酒喝得乾脆，說明了毛能把握機會，明敏果斷。而蕭也感覺一種如兄似弟的人情溫暖，舊債之事，彼此都心照不宣。

這段故事，蕭社長守口如瓶，生前從不告人。筆者在中央社前後服務十餘年，由重慶、南京、廣州到台北，追隨蕭社長半世紀以上，承他不棄，曾三兩次告知此事經過。我的感覺是天下事，貴能掌握機先，如快刀斬亂麻，否則，治絲而棼，不可收拾，真理只有一個，機會也只有一次，一切就看當事人的智慧了。

(原載九十年二月十一日中國時報)

人微言輕

——陳水扁總統的謙沖

本月十四日，陳水扁總統在總統府接見乾淨選舉全國推行委員會會長柴松林等代表二十餘人時，意有所指的說：「人微言輕」。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接著就解釋總統這句話，是表示謙沖，與朝野爭吵數月之久的核四無關。

筆者於十五日各大報看到陳總統「人微言輕」的談話，有點錯愕。按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

「三十六」條：總統統率全國海陸空軍（三軍統帥）。「四十四」條：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讀了以上「三十五」「三十六」「四十四」三條憲法規定，堂堂皇皇的中華民國大總統，位尊權大，負責處理國政，真的是「人微言輕」嗎？此其一。

另外，舉個實例：

陳總統於去年八月，就職後不久，曾往中美洲及非洲作「民主外交，友誼之旅」，到了多明尼加首都，對偵辦尹清楓命案，以堅定語氣對僑胞表示，他不相信辦案到底，會動搖國本，縱使動搖國本，也要辦到底，

以展現決心和意願。此語傳到國內，即獲得不少的喝彩，半年來，因尹清楓命案而涉及的大小官員，不下幾十人，風聲鶴唳，陳總統真的「人微言輕」嗎？此其二。

爲什麼陳總統要說「人微言輕」這句話呢？陳總統自道，做爲民選總統，只是兩千三百萬老百姓之一，沒有什麼特別。不過一場戲，台上台下的角色，完全兩樣，總統爲國家元首，擔負治國大任，「人微」之說，過謙了，過謙的結果，容易引起對若干國家大政卸責的猜疑。憲法「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陳總統當然享有言論的自由，不過，「人微言輕」這句話，出自全民所託，國家前途所賴的領導人，似可商榷。

「人微言輕」一語，源自北宋大文豪蘇東坡的文選，蘇東坡當年曾向朝廷建議大規模興建廨宇（辦公處所），因不受重視，沒有成功，乃自嘆「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數百年來，朝野不少人士，引用「人微言輕」這句話，作爲婉拒各方請託的遁辭，成爲一句最美麗的應酬話。

(原載九十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

歷史是一面鏡子

——陳儀人事行政的檢驗

二二八事件五十四周年紀念日剛過去不久，筆者想起了應負最大責任的行政長官陳公洽（儀）這個人。陳公洽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四日從南京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的，他對記者說：「我到台灣是來做事的，不是來做官的」。當年台灣同胞對政府接管人員所掀起的歡迎高潮，如火如荼，絕非今日所能想像。陳公洽的政績，有正面，也有負面。正面如：〔一〕戰後復員工作，比大陸各地區做得有秩序、有效率。〔二〕遣送日軍日僑歸國，高達四十多萬人，有條不紊。〔三〕保持金融穩定，改用台幣，不受大陸法幣影響。負面所造成的，如千古遺恨的二二八事件，不僅損害他個人的政治前途，也為台灣留下了不少的後遺症，我們如追究病源，不得不歸咎於他的私心和剛愎自用的獨夫性格。最明顯的例子是處理人事行政的失策。曾國藩曾說：「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為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武斷就是陳公洽的寫照。

人事處理上所犯的過失，首先見於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主管的安排，幾乎清一色是福建省政府時代的原班人馬（陳公洽曾任閩省主席八年），而且盡屬江浙兩省人士。三十四年九月，當這批人事於重慶發表後，遠在廈門的閩籍僑領陳嘉庚便極為不滿，立即馳電當時在陪都的國

府蔣主席，認為赴台接管的政府官員，缺少台籍，也無閩籍，與重視台胞及閩台一家的旨意，大相逕庭。蔣主席獲電後，便將當時能說台語的重慶市政府閩籍財政局局長張延哲，改派為台灣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原來的處長嚴家淦，改任交通處處長，而將原來的交通處處長徐學禹調離，轉任招商總局總經理。最令人不解的是台灣銀行董事長不由財政處處長張延哲兼任，而由交通處處長嚴家淦擔任。當年福建省政府時代，徐學禹、嚴家淦、包可永三位財經大員，被稱為省府三傑，和顧問沈仲九都被認為陳公洽的智囊團，不料主政台灣，仍然如出一轍。

這批財經大員到了台灣後，沿用福建省政府實施的管制制度，使在日人統治了半世紀的老百姓們經濟上找不到出路。於是，物價飛漲，生活艱苦，加以其他軍政因素，民眾由希望轉為失望，由失望變為絕望。三十六年春，爆發了「二二八」慘劇，這不是用人私心的結果嗎？

陳公洽處理人事，另一敗筆，還是主觀性太強，未能重用當時的台籍耆宿，如年高德劭的台中霧峯望族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林氏號灌園，民族意識極強，日據時代，領導最有影響力的詩社「櫟社」，且與梁啟超有往來，梁氏號任公，為戊戌變法要角，亦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學問家，梁氏來台，下榻台中林家菜園，回大陸時，留別獻堂先生，有詩云：「人物自是徐孺子，山林不數何將軍」，可知推許之重。

民國九年，林氏曾赴東京領導留學生，向日政府呼籲撤銷「六三法案」，該法案係日人禁錮台胞的特別法。此後又組織「新民會」，創設「台灣文化協會」，以蔣渭水、蔡培火為中心，結合知識分子，展開民

族運動。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林氏曾赴南京參加受降典禮。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是年十二月在台中加入中國國民黨，以後歷任省議員、彰銀董事長、省府委員、省通誌館長等職。

三十五年，陳公洽爲拉攏地方關係，籌設台灣省參議會，議長一席，以林氏當時的年資聲望，可以說「捨我其誰」。陳公洽卻以林氏三十一年曾當選過日本貴族院議員，日本關係不淺，並聽了若干小報告，結果採納民政處處長周一鶚的建議，以被當年台胞稱爲半山的黃朝琴（一八九七——一九七二）出任，他比獻堂先生年輕，台南縣人，日本早稻田與美國伊利諾大學出身，曾任我國駐舊金山總領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與筆者隨前進指揮所同日由重慶飛抵台北，他是外交部特派員，英日文均佳，長我十餘歲，我是中央社特派員。來台不久，黃氏即發表爲首任台北市長。

陳公洽決定黃朝琴爲省參議會議長前，獻堂先生已有所聞，曾透過與筆者交往頻繁的榮星花園創辦人辜偉甫，約我晤談。偉甫兄能說國語和台語，獻堂先生只能說台語，我只講國語，偉甫兄當了翻譯。三十五年夏，獻堂先生由台中前來台北，在博愛路著名的日本料理店「麗都」吃中餐，獻堂先生向我表示兩點意見：〔一〕民國廿五年曾藉「新民報」考察團名義，赴中國大陸華南訪問，於演講中稱中國爲「祖國」，被日本浪人毆辱，惹起「祖國事件」。〔二〕民國三十一年接受爲日本貴族院議員，因時值中日戰爭，有不得已苦衷，以免獲罪。愛國情懷，溢於言表。以上各節，希望筆者能向公署當局轉達，但改不了陳公洽的私心

和偏見。自此之後，黃朝琴當了官派省參議會第一、二、三屆議長，並續任民選省議會第一、二屆議長。

獻堂先生自失去省參議會議長機緣後，心情苦悶，時有失落感。民國三十八年以年老多病，前往東京，並自署其居處為「遁樓」，以明心跡，從此久客不歸。迨民國四十五年，終於病逝異邦。

獻堂先生旅日期間，絡繹於東京道上的台籍親友及不滿政府分子，時來他的寓邸相敘，成為雜音聚散的場所。台北當局憂心時局，從魏道明、陳辭修（誠），以至吳國楨主持省政時，都曾先後邀請嚴靜波（家淦）、彭孟緝、楊肇嘉、蔡培火諸氏赴日勸說早日回台，但都未為林氏接受。

民國四十一年，董顯光出任戰後首任日本大使，鑒於林氏在日為流言所惑，翌年專程回台，探望台籍大老林四爺（柏壽）盼赴日勸說林氏及早回台，囑我代為引見。四爺為台北板橋望族耆宿，望重朝野，亦為我之姻長，曾任台泥、中國商銀、中華開發、台視董事長。四爺深知獻堂先生關懷鄉土，但勸說已為時太晚，這是陳公洽私心另一結果。

獻堂先生典範雖存，相去已遠，他的一生，鬱鬱以終，能不可悲。已故教育部長張其昀，在任時曾興建獻堂館於台北市南海學園，供人追思。

一年來，新政府的用人行政，可以說亂紛紛，許多地方還沒有上軌道，最大原因是欠缺大胸懷、大眼光，若干方面爭小利，打小算盤，計較彼此的顏色。

國父孫中山先生畢生主張「天下為公」、「用人唯才」，治國平天下

者，只要不作清一色的夢，緊握國父這八個字的尙方寶劍，掛布條、燒冥紙、丟雞蛋的抗爭活動，不能全部清除，起碼也會減半，民心所趨，曙光必露。

走筆至此，爲陳公治悲，也希望他的人事作爲，能留給後代借鏡，免蹈覆轍。

(原載九十年三月廿五日中國時報)